目　錄

≈≈≈

澳門報刊的歷史和現狀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一）澳門早期的中外文報刊

澳門的新聞出版事業起源甚早，在近代中國報業史上佔有重要席位。最先出現的是葡文報紙，其次有中、英文雙語報刊；而較後創辦的中文報紙，則爲數最多。

1822 年 9 月 12 日在澳門創辦的葡文週報《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是近代中國第一種外文報紙。刊行僅年餘，於次年 12 月 26 日停辦。此後陸續有葡文報紙在澳門出版，如《澳門鈔報》、《直報》、《澳門郵報》、《戰鬥報》等。

1828 年創刊於澳門的《依涇雜說》，是中國第一種中、英文雙語報刊。內容由英文譯成中文，印刷的方式是將英文鉛活字和中文雕刻木板拼在一起。但因刊載揭露清朝官府陋規的文章，不久即被封禁。

1839 年，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1785-1850 年）奉旨到廣州查禁鴉片，他爲了對外國有更多認識，組織人手翻譯澳門外文報紙中有關外國情況及其對中國禁煙態度的報導，其後輯錄而成《澳門月報》（亦稱爲《澳門新聞紙》）。這是近代中國譯報之始，也可說是中國最早的報刊文摘；有人認爲，這是澳門中文報刊的雛形。

（二）宣揚政治改革的中文報刊

1893 年 7 月 18 日，澳門土生葡萄牙人印刷商飛南第（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mandes）主辦的葡文週刊 *Echo Macaense*（刊名欄署有中文「鏡海叢報」四字），開始出版中文版的《鏡海叢報》週刊，從創刊號起，就經常刊登有關孫中山（1866-1925 年）行醫的消息和廣告，孫中山也曾數次發表署名「孫逸仙」的「聲明告白」。《鏡海叢報》是澳門早期報業中影響較大的中文報刊，行銷廣州、北京、香港和美國舊金山等地；中文版於 1897 年 12 月 25 日停刊，葡文版則出版至 1899 年 9 月 24 日。雖然該刊宣傳的是政治改革，並非革

命思想，但研究孫中山早年活動事跡，《鏡海叢報》是很重要的史料。

1897 年 2 月 22 日，維新派領袖康有爲（1858-1927 年）之弟康廣仁（1867-1898 年）等在澳門創辦宣傳維新變法主張的《知新報》，初爲五日刊，後改爲旬刊、半月刊，成爲維新派在南方的重要言論機關，與上海的《時務報》和長沙的《湘學新報》鼎足而三，對戊戌維新運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戊戌政變後，康有爲在海外提倡的保皇論調風行一時。澳門富商何穗田在其影響下，創辦《濠鏡報》。《知新報》於政變後仍繼續出版，至 1901 年 1 月自行停刊，共出一百三十三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澳門的新風氣。

（三）二十世紀前期的中文報刊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次年中華民國成立，清帝退位，此後澳門等地的中文報業有迅速的發展。在 1910 年代，就有《澳門通報》（1913 年）、《澳門時報》（1916 年）和《澳門日報》（1917 年）的創辦；1914 年（一說 1920 年）創辦的《濠鏡晚報》，是澳門最早刊載本地新聞的報紙，但以「章台艷事」、「花國消息」等爲主要內容，開澳門黃色報紙的先河。1919 年五四運動在北京開展後，澳門有《平民報》（1924 年）和《民生報》（1924 年）的出現。這些報紙都具有規模，版面編排方面較以前有所改進，行文逐漸由文言文轉爲白話文，比較明顯地呈現了新文化的氣息。此後，又有《新聲報》（1928 年）、《朝陽日報》（1932 年）、《大眾報》（1933 年）等陸續問世。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澳門各界人士的抗日救國熱潮，有力地推動了澳門中文報紙的發展。1937 年 11 月 20 日，《華僑報》創刊，在澳門率先使用電訊收報機等先進設備，積極宣傳抗日。其他各家中文報刊也以極高的熱情，投入各項救亡活動之中。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香港淪陷，直至 1945 年 8 月，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其間澳門經濟衰落，物價飛漲，紙張缺乏，報業受到巨大衝擊。《澳門時報》、《平民報》、《新聲報》、《民生報》等先後停刊，深受讀者歡迎的《朝陽日報》和《大眾報》也在 1942 年下半年停辦；另一方面，則有《西南日報》、《民報》、《世界夜報》等親日報紙相繼出現。1944 年 8 月 15 日創辦的《市民日報》，戰後仍然刊行至今。該報內容初以副刊、娛樂消息爲重點，間中加插澳門地方新聞，其後逐漸增加國際新聞和體育消息。1992 年改用電腦激光排版，使版面更爲美觀。

（四）戰後澳門報業的發展

1945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澳門中文報業展開新的一頁。《大眾報》於 1948 年由蔡凌霜復刊，並於 1982 年增設葡文版。1950 年代，中國內地有一批報界人士到澳門工作，對澳門報業的發展起了一些促進作用，《新園地》（初爲旬刊，後改爲周刊）是較重要的一種。1958 年 8 月 15 日，《澳門日報》創刊，《新園地》停辦，成爲該報的一個綜合

性副刊。《澳門日報》發行量近四萬份，約佔澳門中文報紙總發行量的七成。1960 年代，澳門報業受到內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言論較爲激烈，致使銷路下降。

1974 年葡萄牙發生「四二五」革命後，澳門的葡萄牙人政治團體分別創辦了自己的報紙，影響所及，澳門的葡文報紙在 1980 年代展現了活力。除了公民協會的《澳門晚報》、民主聯盟的《澳門論壇週報》、自由協會的《澳門人報》之外，澳葡當局也通過其代理人創辦自己的輿論報刊，例如高斯達時代的《澳門郵訊報》、《東方週報》等。澳門天主教教區，也有自己的機關誌《號角報》。近年在澳門刊行的葡文週報，有《商報》、《句號報》等。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澳門報業在 1980 年代獲得新的發展機遇；尤其是從 1986 年 6 月起，中、葡兩國開始就解決澳門問題進行談判，澳門居民越來越關心時事和政治、社會發展，致使中文報刊的銷量隨而大增。

與此同時，各種中文週報應運而生，其中較受注重的，有《澳門人週報》、《澳門脈搏》、《澳門地產報》等；1989 年創刊的《華澳郵報》，1994 年改爲《華澳日報》繼續出版。

進入 1990 年代以後，激光照排技術的運用給澳門的報紙帶來全新的視覺效果，彩色欄目所佔的版面陸續增加，使報紙產生更大的吸引力。繼《市民日報》改用電腦激光排版之後，《大眾報》於 1993 年改爲彩色印刷。

（五）澳門報刊的現狀

澳門現有的中文報紙之中，歷史最悠久的是 1933 年 7 月 15 日創刊的《大眾報》。該報在 1982 年 3 月增設葡文版，成爲當時澳門唯一中、葡文並載的報紙。1937 年由香港《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派出趙斑斕、雷渭靈等人到澳門創辦、作爲《華僑日報》澳門版的《華僑報》，從 1967 年起與《華僑日報》分家，人事和經濟均獨立自主。香港的《華僑日報》已停辦，澳門的《華僑報》則持續至今；該報自 1980 年代以來，還陸續出版了一系列專門的參考工具書。

由於香港出版的報刊大多在澳門同時銷售，所以澳門報業面對的競爭非常大。現時在澳門報界佔較大席位的，是上述 1958 年創刊的《澳門日報》和 1963 年創刊的《星報》等。此外，還有《市民日報》、《正報》、《現代澳門日報》、《新華澳報》等日報，週刊則有《時事新聞》、《訊報》、《澳門文娛報》、《澳門脈搏》、《體育週報》和《澳門觀察報》等。

近年免費報刊成爲時尚，2006 年創刊的《品報》是推廣澳門美食的月報，2007 年創刊的《澳門勞動報》由雙週刊發展爲週報，其趨勢和影響均值得注意。

澳門現時出版的主要報刊

中文名稱	葡文/英文名稱	刊期	創刊日期	備　註
大眾報	Tai Chung Pou	日報	1933 年 7 月 15 日	是澳門現存中文日報中創辦歷史最長的一份報紙，1946 年曾停刊，1948 年復刊。1982 年設葡文版，成爲當時澳門唯一中、葡文並載的報紙
市民日報	Jornal Do Cidadao	日報	1944 年 8 月 15 日	2000 年 9 月 1 日改爲彩色印刷，另有《金融經濟論壇》（雙週刊）及週刊《車世界》、《文化資訊》、《美食天地》等專刊出版
澳門體育報 / 體育日報/ 正報	Jornal Cheng Pou	週刊/ 日報	1978 年 1 月 7 日	1981 年改名《體育日報》；1983 年易名《正報》
星報	Jornal Estral Seng Pou	日報	1963 年 10 月 5 日	對象以中小商人及知識份子爲主，內容注重娛樂、消遣方面的報導
時事新聞	Si-Si Jornal	週報	1972 年 11 月 15 日	逢週六出版
訊報	Son Pou	週報	1989 年 3 月 18 日	逢週末出版，主要刊登中國內地和澳門地區社會、政治、經濟的評論文章
現代澳門日報	Today Macau Journal	日報	1987 年 3 月 8 日	其前身爲《現代澳門》週報，1991 年 4 月 15 日改爲日報，著重報導地方突發新聞
華僑報	Jornal “Va Kio”	日報	1937 年 11 月 20 日	趙斑斕主辦，與香港《華僑日報》原是一家，至 1960 年代獨立；是綜合性報紙，且爲澳門連續出版時間最長的報紙
華澳郵報/ 華澳日報/ 新華澳報	Jornal San Wa Ou	週報/ 日報	1989 年 12 月 20 日	1994 年 12 月 20 日易名《華澳日報》；2004 年 4 月 3 日改名爲《新華澳報》，著重報導地方新聞和政治新聞評論
澳門文娛報	Recreativo De Macau	週報	1991 年 12 月 28 日	主要報導文娛、體育消息，逢週三出版
澳門日報	Macao Daily News	日報	1958 年 8 月 15 日	發行量和廣告量長期居澳門中文報紙首位，是澳門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日報；另定期出版《澳門馬經》（週二刊）和《世界波經》（週刊）
澳門脈搏	Jornal “Opulso De Macau”	月報/ 週報	1990 年 4 月	何思謙議員辦事處創辦，同年 4 月 20 日改爲週報，刊登澳門各報評論和澳門主要新聞、社會趨勢及言論，逢週五出版

體育週報	Semanario Desportovo De Macu	週報	1980 年 11 月 15 日	專刊體育消息和評論，1990 年後獲澳門政府津貼支持，逢週六出版
澳門觀察報	Observatório de Macau	雙週報 / 週報	1995 年 1 月 16 日	澳門天主教教友協進會出版
品報	Tastes Gazette	月報	2006 年 10 月	推廣澳門美食的免費刊物
澳門勞動報		雙週刊 / 週刊	2007 年 8 月 1 日	免費刊物

參考書目：

- 《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 年。
- 黎小江、莫世祥主編《澳門大辭典》，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 年。
- 方積根、王光明編著《港澳新聞事業概觀》，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 年。按：此書後篇爲「澳門新聞事業」，記述澳門的報業、通訊社、廣播電視業、新聞工作者社團組織和澳門新聞署。
- 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主編《港澳台海外華文傳媒名錄》，香港：香港中國新聞出版社，〔2005 年〕。按：此書「澳門」之部，介紹澳門現有中文報刊及電視公司。
- 程曼麗著《〈蜜蜂華報〉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按：此書對《蜜蜂華報》創辦的歷史背景、客觀原因和該報內容、文體、政論文章和傳播手段作了分析，並評價其歷史作用及影響。
- 湯志鈞、湯仁澤著《維新・保皇・知新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年。按：此書是研究《知新報》的專著。
- 澳門日報編《澳門日報三十年》，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88 年。
- 鍾紫主編《香港報業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 年。按：此書附錄〈澳門的新聞傳播事業〉一文。
-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 1 至 3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1999 年。
-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上、中、下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按：此書是現時有關方面最詳盡的編年史著作，澳門新聞事業亦包括在內。
- 丁淦林主編《中國新聞圖史》，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2 年。按：此書第十九章介紹澳門報業的發展。
- 劉羨冰編著《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澳門：編著者自印本，2002 年。
- 張國雄、岡虎、張運華、戴永潔編著《澳門文化源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變革中的澳門歷史教育

張偉保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一）引　言

隨著澳門回歸、課程改革及澳門城區成爲世界文化遺產，澳門歷史教育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無論在正規課程的規劃及作爲社會教育的一個主要部分，均面對著鉅大的變革。澳門歷史教育在不同教學階段現正逐步進行變革中，總的方向是對歷史教育的重要性作出更大的肯定。在非高等教育領域內，從課程內容以至師資培訓工作，正在進行較大範圍的改善工作。至於作爲澳門最高學府——澳門大學，其教育學院與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亦相繼推出增強歷史教育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因此，澳門歷史教育的變革雖然仍處於起始階段，相信在未來數年內將會取得較大的成績與進步。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在教學方法、教科書和升學考試等問題，將仍困擾前線的歷史教育工作者，需要更大的力度與投入更多的資源，才足以糾正目前的一些不正常現象。

（二）澳門歷史教育的現況

澳門歷史課程可分爲三個階段：

（1）**小學階段**：常識科中的歷史教材通常均與地理教材合爲一個單元，所佔授課時間較少。以 2001 年出版的現代教育出版社《現代澳門常識》爲例，有關澳門和中國的史地編置於四年級《單元三：澳門的地理環境與歷史》和五年級《單元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內地》。由於材料較少，故學生所獲歷史知識其實相當有限。

（2）**中學階段**：澳門中學學制主要爲 3-3 制，即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也有採用 5-1 制的情形，但數量較少。以歷史科而論，初中課程包括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和澳門史的範圍。課時安排上一般只有兩至三節。由於講授的範圍較多，老師往往需要趕進度，形成以單向形式的授課，較少討論和分析，不利於鼓勵同學的學習興趣和探究精神的培養。高中課程則集中中國歷史和世界近代史，通常中四、五講授中國史，中六講授世界近代史。一般而言，程度其實是仍屬中五水平。此外，中六下學期多安排應試訓練爲主。由於親中學

校和天主教會學校學入的升學方向不同，學校在應試訓練的內容亦有很大的差異。舉例來說，投考國內大學的學生，以暨南大學、華僑大學的人數較多，他們會利用歷屆試題爲主，並使用專門爲投考此類大學而編寫的參考書。澳門學校多使用暨南大學文學院爲「暨南大學、華僑大學聯合招考港澳台籍學生考試複習叢書」所編的《歷史》。其內容以中國古代史、近代史和現代史（至中國加入 WTO）。外國史則集中近代史和現代史兩部分（至蘇聯解體）。整體而言，均有詳近略遠的傾向。至於投考台灣各大學的，則以歷屆試題爲主，再以此地區出版的中國通史、西洋通史爲的部分內容作參考。此外，澳門親中學校在初中使用的教材，香港版和國內版均屬普遍，而高中則一律使用國內版教科書。以升學台灣爲目標的教會學校，中一至中五多採用香港版的中國史和世界史教科書。只是近年香港的歷史課程（西史）有較大的改變（如中四、中五課程只包括二十世紀世界史和香港史），故部分澳門中學仍採用舊版的課本。此種情形也引致前線教員的產生相當大的困擾。

此外，雖然教育暨青年局於 1999 年的歷史課程規定初中講授 8-15 節的澳門史，實際上是由於課程的緊迫，只有少部份學校能按照處理。其餘大部份學校把作爲暑期班讓同學選修，甚或付之缺如。整體情況並不理想。同時，由於沒有相關的教科書或教材，授課老師便需自編材料，額外加重教師的負擔。而材料亦難臻理想（作者按：2006 年 12 月，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出版了《澳門歷史：初中補充教材》，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3）**專上階段**：澳門特區以澳門大學爲唯一的綜合性大學的專上院校。[1] 大學的社會科學人及文學院至今仍尚未正式設置歷史系或相關專業課程，故澳門迄今尚無專門的歷史課程和系所。然而，大學對此將加大有關科系的資源投入，並在本年 9 月聘請兩位歷史專業的副教授或助理教授擔任相關的工作。同時，該學院亦連續組織了多次歷史學的專題講座，邀請不同地區的學者來澳講演。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近年十分關注澳門歷史教育的推展工作。在 2003 年開始，本院增設學士學位的「歷史教學」副修課程，由鄭潤培博士主持。此外，本院新任院長單文經教授對歷史教育和教育史的推展十分熱心。在台灣師範大學工作時，單氏曾主持《鹿港鎮志・教育篇》的編纂[2]。現在，他又規劃澳門教育史及口述歷史的工作。在最近的一個項目中，是以搶救澳門教育史料爲主的人物傳記和圖書資料的收集和整理，本院現有七位同寅參與有關課題。此外，爲回應澳門歷史科老師多由中文科老師兼任，而未具備歷史專業訓練的情形[3]，教育暨青年局委託本院設計了一個「歷史教學補充課程」。展望未來，本院通過系統地爲本地中史科教師提供不同的培訓，澳門歷史科師資的優化將可逐步實現。

1　其餘專上院校包括理工€學院、旅遊學院（以上公營）、澳門科技大學（私立）等。

2　單文經主編：《鹿港鎮志・教育篇》（鹿港鎮公所，2000）。

3　陳子良：〈澳門中學歷史教學的現狀與培正中學歷史科的改革路向〉，頁 167，收於蘇慶彬主編：《跨世紀學科教育——中國語文、歷史與地理教學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00）。

此外，本院的小學學位課程亦提供關方史地教學的專門訓練。目前，同學均需修讀以下兩個課程：「歷史與地理」和「史地教學」。雖然兩者均屬學期課程，但對日後任教常識科的老師應有一定的幫助。

（三）課程改革中的澳門歷史教育

回歸後的澳門特區政府，對教育作出較大的支持。隨著經濟的改善，政府正規劃十五年免費教育。由於歷史的原因，本地課程雖經教育暨青年局整理推行，但各個辦學團體均以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保留其對教學內容的自主權。結果是政府通過私立學校聯網的架構資助各辦學團體，而其所教授的內容只能作出建議，卻無法強行要求其依據已經制訂的課程大綱。

最近，澳門特區政府通過推行學校評鑑來進一步提昇學校的整體質素，並協助其未來的發展。通過這種安排，政府開始加強對學校課程的管理。其中，學校是否有完備的課程大綱，便是評鑑的一個重要指標。因此，預計此類評鑑活動將會吸引更多的學校參照教青局的課程大綱進行教學安排，或至少對其現行課程定排的合理化與完善化作出適當的調節。目前，教青局亦正委託澳大教育學院重新審訂澳門非高等教育的各項課程，作爲未來教育改革的參考。

在澳門特區政府資源相對充裕、社會氣氛比較和諧的大環境下，歷史教育或會產生相當正面的影響。首先，學校在資源較前豐富的前提下，歷史課程規劃將會配合「以學生爲本的探究式教學」，亦即以減少相對繁雜的教學內容，並以培養探究精神、理解分析爲主的學習方向。北京師範大學王英傑教授曾在 2000 年針對澳門的教學情況撰寫〈「減負」——澳門教育改革的一個主題〉[4]。王氏以初中爲例，澳門學生的基本課時爲每周 1480-1850 分鐘，而內地的相應數據爲 1400 分鐘，低於澳門教育法令規定的最低限。但是，與內地相比，由於澳門有多種的升學渠道，也不存在統一的會考或升學考試，澳門的學生升學壓力較少。因此，澳門的中小學課程改革必須在減少授課時間、課後作業、課後補習方面作出努力。同時，對於重知識傳輸，忽視學生能力的培養；重智育，輕道德教育的種種偏差，均須加以糾正。[5] 以中國史爲例，2004 年出版的《新理念中國歷史》（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以「鼓勵探索式學習」爲目標，幫助學生成爲主動的學習者，對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有顯著的效果。隨著香港在 2009 年實行 3-3 制，整個大中華地區的學制基本劃一，此將有助解決澳門與香港學制上的分歧所帶來的困擾，特別是教科書的規劃方面。

4　王英傑：〈「減負」——澳門教育改革的一個主題〉，頁 197-205，收於梁成安主編：《澳門教育如何邁進新紀元》（澳門大學教育學院，2001）。

5　同上文，頁 200。

（四）澳門城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教育意義

2005 年 7 月 15 日，澳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u）成爲中國第三十一個世界文化遺產，澳門歷史教育自然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事實上，澳門的歷史在香港開埠以前已相當重要。16-18 世紀的澳門，是東西商貿與文化交流的中心，建立了四條重要貿易路線：

（1）澳門——果亞——里斯本貿易路線

（2）澳門——長崎貿易路線

（3）澳門——馬尼拉——美洲貿易路線

（4）澳門——望加錫——帝汶貿易路線[6]

由於管治澳門的葡人早年基本採取順應明、清政府的方針，至 1840 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前，雙方關係尚屬平穩。此段約三百年的歷史，由於澳門的經濟相當繁榮，澳門人口雖有起伏，整體情況變化不大。大量古建築物便陸續出現，如大三巴、仁慈堂、大炮台、聖若瑟修院及聖堂等建築群。隨著時間的流逝，其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日益顯著，成爲澳門城市至可寶貴的文化資源。[7] 澳門文化局局長何麗鑽表示：

> 此次提出申報的澳門歷史建築群，它向世人展示的，不僅是中國境內現存最古老、最集中的西式建築群，不僅是中國以至遠東地區西方宗教文化的生動見證和中國民間信仰別樹一幟的獨特反映，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在 400 多年的歷史裏，中國人與葡萄牙人合力經營的獨特的生活社區。這個生活社區，除展示澳門中、西建築藝術特色外，更展現了中葡兩國人民不同宗教、文化以至生活習慣的交融與相互尊重。這種中葡人民共同醞釀出來的溫情、淳樸、交融的社區氣息，是澳門最具特色、最有價值的所在。[8]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個分析是全面而正確的。澳門的歷史在近世、近代中國史上扮演獨一無二的角色。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的教育意義非常顯著。舉例來說，澳門培正中學早於 1991 年成立史地學會，主要負責老師爲黃就順（地理科）和陳子良（歷史科），兩位均爲澳門的的資深老師。在他們的推動下，培正中學史地學會在 1991 年成立。黃就順先生在 2001 年回顧時培正中學史地學會十年來的發展時說：

---

6 參看黃啓臣：《澳門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 36-55。

7 楊允中、黃鴻釗、莊文永等：《澳門文化與文化澳門——關於文化優勢的利用與文化產業的開拓》（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5 年），頁 229。

8 轉引自同上書，頁 228。

培正史地學會成立的宗旨：為促進同學了解澳門，認識祖國，放眼世界，提高史地科水平及增進同學之友誼。回顧十年來應屆會員都循著建會的宗旨，邁步完成任務，可喜可賀。

為了促進同學認識祖國，學會每年組織會員前往國內考察，實現第二課堂教學的要求。理論與實踐結合，不斷提高會員史地科之水平，也從考察過程中增進了同學間之友誼，發揚互助互愛的精神。

在實地考察及拍攝大量有關史地之照片，放大後公開在校內展出，讓全校同學分享考察的成果，並間接提高史地科的常識。

學會還組織會員澳門一日遊，考察澳門廟宇、教堂及名勝古跡、海岸線變遷、地形、城市規劃、水文狀況，亦曾組織會員參觀垃圾焚化爐、污水處理廠，深入了解澳門環保實況。

老師或會員利用假期出國旅遊所拍之照片亦在校內放大展覽或出版刊物，以達到同學們放眼世界的目的。

通過每次考察寫成的報告，將所見所聞、或感想等文章整理及編輯成《紅藍史地》刊物，每年一冊，現已出版十期，一九九六年起學會還彙集歷史考察報告，出版《澳門百業》，至今已出至第三集，大獲社會好評。[9]

此外，原本任職澳門培道中學、現任澳門旅遊學院的林發欽先生，以澳門培道中學歷史學會輔導老師的角色指出：

在上中國歷史課的時候，我時常向學生順帶提及與澳門有關的歷史內容，發現同學們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促使我生起在校內成立歷史學會，組織同學進一步研習本土歷史的想法。我這個想法提出後，得到同學和學校積極的響應，“培道中學歷史學會”便在這種背景下於 2002 年九月成立。

歷史學會是培道中學一個由學生自主的學術團體，作為負責老師，我的責任是輔導而非主導，讓學生自行開展專題研習活動。所謂專題研習，是指由教師設計若干專題，並提供相關的參考文獻和網絡資源，讓學生自由分組，充分利用如圖書館和檔案館等社區資源，通過研究性的協作學習，探討澳門的歷史滄桑、名人軼事、風物掌故等史事。這是一種以學生自學為主的學習方式，強調學習的過程和參與程度，試圖使學生透過對本土歷史文化的探索，養成對澳門歷史的興趣，以後繼續自發學習，進而達致由點到線及面的教育目標。[10]

---

9 以上資料均採自該學會網頁：http://students.puiching.edu.mo/hga/index.php?page=02g.

10 以上資料均採自該學會網頁：http://history.pooito.edu.mo/tmessage/tm.html。林發欽先生在主編《澳門街道的故事》（培道中學歷史學會，2004）及《澳門歷史建築的故事》（培道中學歷史學會，2005），分別成爲該年度的暢銷書。

由此可見，同學在經過老師的精心訓練與學校的積極支持下，對歷史科的興趣和能力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探究式教學是現代教學的一種以學生爲中心的教學模式。同學通過「指導式探究」（guided inquiry）開展對以上領域的課題的探究。[11] 而教育學家蘇克曼（Richard Suchman）曾進行一系列有關「探究訓練」的實驗（inquiry training），對於探究教學法有重要的貢獻。[12] 以上兩例是成績較爲突出的。澳門一般中學也有同類型的史地考察活動，只是效果沒有那麼明顯。這種重視第二課堂的趨勢以增強學生自行探究問題的能力。當然，這亦可訓練同學的合作精神和組織能力。隨著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的確認，這種學習方法應可持續在澳門中學中推廣，並獲得家長以至社會大眾的普遍接受。

（五）小　結

本文著重介紹（1）澳門歷史教育的現況；（2）課程改革中的澳門歷史教育；（3）澳門城區成爲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教育意義。通過這三方面指出澳門歷史教育的方向與面貌，總的方向是澳門教育當局、歷史教育工作者和澳門社會，均對歷史教育的重要性作出更大的肯定。通過本文所析述的情形來看，澳門歷史教育改革的前景仍算樂觀。而在教學方法、教科書和升學考試等問題上，解決的方法仍不外是資源的更大投入，這在澳門未來數年內，是有較大的可能性。

11　此種學習方式是「協助學生如何學習」。教師可在學生進行探究之前或在探究之中給予指示和引導，而後再讓學生實際進行探究並自行發現答案所在。參看林寶山《教學原理與技巧》（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頁 167-171。

12　詳細步驟可參看同上書，頁 169-170。

附件一　歷史教學副修課程之學習計劃

科目	種類	每週學時	學分
中國通史 I	必修	3	3
中國通史 II	‘’	3	3
世界通史 I	‘’	3	3
世界通史 II	‘’	3	3
中學歷史教學法	‘’	3	3
澳門史	選修*	3	3
歷史教學研究	‘’	3	3
歷史課外活動教學	‘’	3	3
中國教育史	‘’	3	3
中國社會經濟史	‘’	3	3
中國近現代歷史專題	‘’	3	3
總學分			21

***** 學生須從選修科目中選讀兩門。

附件二　歷史教學補充課程

課程目的

本課程主要爲一些並非在大學修讀歷史專業，而在中學任教歷史科的老師而設。透過這個課程，學員不但可以提高歷史知識，更可以學會怎樣把知識融入教學技巧中，並能全面認識歷史科的課程，從而提升歷史教學的質素，使能成爲澳門任教中學歷史科的合格教師。

入學要求

凡在大學並非修讀歷史專業而在職任教歷史科的老師。

課程架構

學員必須完成 6 個課程，共 18 學分。

課程科目

課程名稱	學分	學時	總時數
（1）中學歷史教學與評鑑	3	3	45
（2）歷史課外活動設計與教學	3	3	45
（3）中國歷史課程與教學	3	3	45
（4）世界歷史課程與教學	3	3	45
（5）澳門歷史課程與教學設計	3	3	45
（6）歷史科教學實習	3	每學生全年視學三次	

陶行知的教育理念與專題研習

李炳坤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科技服中心

陶行知 1891 年出生於安徽省歙縣黃譚源村一個醬園之家。1910 年入讀金陵大學文科。1911 年經歷辛亥革命，爲國父孫中山先生感召贊同民主共和，一度參加徽州屯溪湖余家莊的起義。1912 年研究王陽明「知行合一」理論，1913 年任校報《金陵光》中文版編輯並以「知行」爲名發表文章；同年在校辯論〈中國能否建立民國〉獲勝。1914 年，陶行知在其社評〈民國三年之希望〉中說：「閱報章，則荆棘滿紙；游街衢，則瘡痍遍地……視此國家，對茲社會，皆哀有餘，而樂不足……誰使我抱無涯之戚哉？」[1] 其改革社會的抱負已躍然紙上。同年 6 月，陶行知宣讀其畢業論文〈共和精義〉，指出自由、平等、民胞爲共和的三大信條；而國民程度不足視爲共和險象之首，並證教育實乃建設共和最重要的手段。（參閱表 1）

1914 年夏，陶行知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一年即獲文學碩士，其畢業論文〈中國租地〉的結論指出：「中國 1898 年時租借予外國勢力的膠州、關東（含旅順及大連等）、廣州灣、威海衛及九龍五地實乃中國門戶，要恢復它們的管治主權，國人責無旁貸。」[2] 可見陶行知愛國情切。1915 年 6 月，陶行知在美國基督教青年會表明「經由教育……創造一個民主國家」的決心。同年秋，陶行知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受教於杜威、克伯屈及孟祿等一時俊彥，與胡適同學。1916 年陶行知致函羅素院長時矢言：「余將回國與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爲我國人民組織一高效率之公眾教育體系……因此乃唯一能夠實現的正義而自由理想國度之法。」[3]

1917 年，陶行知回國擔任前線教育工作外，復大力鼓吹中國教育革新運動。1919 年起分別邀請杜威、孟祿、克伯屈等來華，爲中國本土的教育改革作科學調查分析、觀察及

1 《陶行知全集》卷 1（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198。

2 Tao, W.T., *Leased Territories in China* (unpublished pap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15.

3 《陶行知全集》卷 6，頁 615。

指導。1920 年，陶行知完成哥倫比亞大學考取博士學位的論文稿本〈中國教育哲學與新教育〉，惜燬於火。唯陶行知終生對中國 20 世紀 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教學法、普及教育、平民教育、婦女教育、文字改革、師範教育等皆有湛深研究與實踐上的貢獻。1936 年他以國民外交使節身分出訪歐美亞非 28 國歷時兩年，返國後以培養人才爲己任，在 1939 年創辦育才學校，使他的教育專業提升至另一高峰（參閱表 1 及表 2）。

由此可見，「主共和」、「學市政」、「攻教育」這三角關係在「知行一」的原則與推動下，成就了陶行知終生這種既承前又創新的教育救國宏願。

專題研習（project learning）的定義

「專題」（project）一詞，首先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勞作科主任李查特（Richards）於 1900 年提出，主張勞作的訓練應由學童按自己的計劃去進行，而不應依教師的規定從事[4]。及 1918 年 9 月，名教育家杜威（Dewey）的學生克伯屈（Kilpatrick）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報》第 19 期上發表了〈專題教學法〉（The project method）一文，指出學童自發地決定學習的目的和內容，然後透過自己設計和負責實行的專題活動，才可運用已有的知識經驗，通過自己的操作，在具體的情境中獲得有關知識，解決實際問題。此法否定了班級授課制，打破學科界限，摒棄教科書，強調教師的任務在利用環境以引起學童的學習動機，幫助學生選擇活動所需的材料等；而其一般程序爲：決定目的、訂立計劃、實行和評價[5]。

專題教學法源於杜威所倡導的「問題解決法」（problem solving）[6]，而問題解決法的中心思想，實來自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以杜威爲首的此派學者視兒童爲不斷改造其經驗的生物，兒童在環境中，爲欲適應環境，乃不斷運用本身的智慧去體認環境和調適環境。而在調適環境的歷程中，一面增加新經驗，一面改造舊經驗。此種新舊經驗的不斷改造及增加，即是教育的作用，也便是兒童的學習歷程[7]。

經過整整一個世紀的演變，不同的教育學家對「專題」（project）一詞有不同的演繹，其中文譯名亦有所不同。早期的中文典籍多將 project approach 或 project method 譯爲「設計教學法」（參閱表 2）。近年，台灣稱之爲「方案教學」或「項目活動教學」[8]；香港稱之

---

4 轉引自簡楚瑛《方案教學之理論與實踐》（台北：文景，2001 年）；趙李婉儀〈專題研習——學會學習的實踐〉（2002 年），2006 年 3 月 2 日擷取自 http://www.fed.cuhk.edu.hk/~qsp/new/passage/project/ p001.htm?passage_code=./passage/small/project/p001.htm.

5 Berman, S., *Project Learning for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s Classroom* (1997); 夏惠賢等譯《多元智能與項目學習——活動設計指導》（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6 Dewey, J., *How We Think* (1933); 杜威著，姜文閔譯《我們如何思維》（台北：五南）。

7 Kilpatrick, W. H.,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951)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8 簡楚瑛《方案教學之理論與實踐》。

爲「專題研習」（project learning）；而上海則將類似的學習模式稱之爲「開放性主題學習」[9]。在定義上，推行此法甚力的美國學者 Katz 及加拿大學者 Chard 稱，這是「針對一個與真實生活有關而又值得學生花時間及精神去探索的主題作深入探討」的一種求學過程[10]。近年，美國哈佛大學的學者則將「專題」界定爲「一種長線的、疑難爲本及有意義的活動，而在不同學科或領域中凝聚原則或主意」的學習過程[11]。台灣學者簡楚瑛指出，專題研習是一種目標導向的教學方式，它強調「做」、「思考」及整體學習活動對學生的意義，同時是強調「步驟性」的一個學習過程。[12]

在香港，課程發展議會認爲，專題研習是一種推動學生自主學習、自我監控和自我反思的學習方式，它以富於挑戰的難題引起學習興趣，並把知識、共通能力、價值觀與態度結合起來進而建構知識，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和態度[13]。香港中文大學趙李婉儀稱，專題研習是學生圍繞著一個其本人有興趣及值得探討的疑問（problem），計劃如何透過有效的資料搜集、整理、分析、綜合、評鑑、反思、創意、主動參與、溝通協作、探究解難、不斷嘗試、同儕互學等過程，對先前懷疑的問題作出結論，歸納出一些新論據，或建構出一些新知識的經歷[14]。而香港教育學院學者則認爲，專題研習並無統一定義，但普遍認爲這種學習策略應具備六項基本特點：（1）以學生爲主導；（2）對某一主題進行深入研究；（3）內容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4）通常以小組形式進行；（5）有利跨學科學習，以及（6）長時間進行[15]。

在中國，專題研習是指在教師指導下，學童以類似科學研究的方法去獲取知識的學習方式[16]；亦被解釋爲一種以培養學生不斷追求卓越態度，和在社會生活中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學習方法，並按小組或個人採用 「研究性學習」方式由學生自覺開展的課程[17]；同

---

9 仇忠海、霍益萍《開放性主題活動課程——上海市七寶中學新探索》（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年）。

10 Chard, S., *Project Approach* (2000). Received 2 March 2007, from http://www.project-approach.com.

11 Goodrich, H., et al., *Teaching through Projects* (California: Addism-Wesley, 1995).

12 簡楚瑛《方案教學之理論與實踐》。

13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1 年）；教育統籌局〈資訊科技應用——專題研習〉（2003 年）。2003 年 10 月 22 日擷取自 http://resources.ed.gov.hk/ project_work/intro.htm.

14 趙李婉儀〈專題研習——學會學習的實踐〉（2002 年），2006 年 3 月 2 日擷取自 http://www.fed.cuhk.edu.hk/~qsp/new/passage/project/p001.htm?passage_code=./passage/small/project/p001.htm.

15 鄭美紅《專題研習的設計與實踐》（香港：中華科技出版社，2006 年）。

16 仇忠海、霍益萍《開放性主題活動課程——上海市七寶中學新探索》。

17 李金巧、楊向誼編《讓孩子學會研究——小學生探究性學習實踐指導》（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

時，它也取名爲「做中學」，即透過學童對自然現象的親身經歷和科學發現過程，提出問題、設計並做實驗、觀察紀錄、解釋討論、表達陳述，從而激發學童學習的主動性，喚起其好奇心，使他們從小有科學的態度、尊重事實和別人、學會與人合作、培養個人批判思維的一種學習方式[18]。前者自 1999 年在徐滙區第一中心小學開始[19]，後者在 2001 年由中國教育部和中國科協共同發起，至 2003 年 11 月已由教育部基礎教育司推廣到 17 個城市 200 餘所學校[20]。

陶行知的教育理念與專題研習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理由有 7 點：

（1）教育理念治學成就的突顯性

陶行知在 1939 年創辦育才學校，以社會作研習的平台，以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方式栽育學童，實踐 7 年以來，培養專業人才 500 餘名。陶行知 1946 年逝世後，其學生繼承衣砵，解放前亦培養了 600 餘名專業人才，如中央音樂學院指揮家陳貽鑫、〈紅色娘子軍〉及〈1997 序曲〉作曲家杜鳴心等，其中不少獲中國國務院頒發專家特殊津貼[21]。陶行知教育成就極高，郭沫若喻他爲孔子或孫中山[22]；他的學生王越認爲他的立德、立功、立言皆不朽[23]。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李鵬等國家領導人多次高度評價陶行知及其著作，而江澤民稱他爲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日本專修大學教授齋藤秋男稱他爲「新中國教師之父」[2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曾確定他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25]。可見，陶行知以他底教育理念在中國本土治學的成就十分突出，也證明了陶行知教育理念在中國的推行有一定適切性，貢獻良多。

---

18 中國教育部及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做中學」科學教育專家組編《「做中學」在中國》（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 年）。

19 李金巧、楊向誼編《讓孩子學會研究——小學生探究性學習實踐指導》。

20 中國教育部及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做中學」科學教育專家組編《「做中學」在中國》。

21 周洪宇編《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汕頭市陶行知研究會編《陶園新葩》（汕頭：汕頭市陶行知研究會，2001 年）；周毅、金成林編《創造奇葩——陶行知的弟子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22 樂喜〈試談陶行知先生的評價問題〉，刊於《安徽史學通訊》總第 3 號（1958），頁 20。

23 李炳坤《陶行知專題研習的教育理念分析與它對香港 21 世紀教育改革中專題研習的啓示》（未出版哲學碩士論文；香港：香港浸會大學，2007）。

24 任世杰、吳一德編《學陶師陶一百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年）；戎師陶〈探索行知精神的真諦，爭做行知精神的傳入〉，刊於廣東陶知知研究會編《廣東陶研》30 期（2005），頁 11-12。

25 陳仲豪〈陶研事業的持續發展和開拓創新〉，刊於汕頭市陶行知研究會編《汕頭陶研》76 期（2003），頁 1-5。

（2）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與其有關用語的發展歷程

1917 年秋，陶行知由美學成返國，旋即投入中國教育的改革事業，對歐美的試驗主義教育方法推崇備至[26]。至 1923 年，由西方引入的設計教學法（即克伯屈「專題研習」，中國 20 世紀初稱「設計教學法」）在中國的實驗達到高峰[27]，陶行知顯然是一位舉足輕重的支持者。1921 年，他倡議全國高等師範的老師負起發現學理、印證學理、實習學理和推廣學理之責，以及 1922 年他讚揚設計教學法是「依計劃去找實現法」，即爲明證。1923 年下半年，南京東南大學附中發表對西方引入教育方法的試驗報告，指出實驗班成績稍遜[28]。1925 年，陶行知撰文痛斥中國教育抄襲日、英、德、法、美的因循，認識到「欲教育之刷新，非實行試驗方法不爲功」，教改之風吹遍全國。1926 年，陶行知「教學做合一」教學法的理論得到系統敘述。翌年，陶行知借鑑杜威的教育思想，重視教育和生活與社會相聯繫的道理，正式提出「教學做合一」教學法：「教的法子要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要根據做的法子；教學做是合一的。」[29]

1927 年，陶行知以「教學做合一」爲校訓，創辦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無疑是他對「教學做合一」進一步的認知。同年 7 月，陶行知發表〈行是知之始〉一文，概括「學」的規律爲：「行動生困難，困難生疑問，疑問生假設，假設生試驗，試驗生斷語，斷語又生行動，如此演進以至無窮。」[30] 可見，陶行知此時已將「做」的概念融入源於杜威及克伯屈的教育思想，並將專題研習教學法進一步改良至適合當時國情的需要。1928 年 4 月，陶行知稱「教學做合一」與設計教學法的道理相近，更證明「教學做合一」是專題研習的改良。

陶行知將杜威「教育即生活」理論加以實踐之後，到 1929 年提出「生活即教育」理論，開始超越杜威的教育思想。同年 10 月，陶行知將「小學」與「研究」結合於「教學做合一」之中，無疑是 1941 年育才學校「幼年研究生」制的萌芽。1932 年，陶行知在〈兩位先生的對話〉一詩中，簡單而清晰的說明「教學做合一」與「設計教學法」基本上只有「出汗與否」的差異[31]。同年中國爆發內戰，陶行知旋在全國辦起工學團，將工場、學校、社會混成一片，打破傳統學校的界限，極大地豐富了「教學做合一」的理論體系，給陶行知領悟和發展了「教學做合一」這種「中國本土化的專題研習教學法」。

1934 年 7 月，陶行知發表〈行知行〉一文，並將沿用 23 年的名字「知行」改爲「行

---

26 畢誠、程方平《中國教育史》（台北：文津，1996）。

27 崔運武《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年）；周險峰、張春紅〈陶行知與近現代教學法中國化〉，刊於湖北大學學報編輯部《湖北大學學報》28 卷 2 期（(2001 年)），頁 78-83。

28 湯才伯《廖世承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年）。

29 《陶行知全集》卷 1，頁 125-126。

30 《陶行知全集》卷 2，頁 140。

31 《陶行知全集》卷 7，頁 43-44。

知」，明顯點出以「做」得到「知識」的真理。1941 年 6 月，陶行知的「行知行」教育理念已具體概括爲「人類和個人最初都由行動而獲得真知，故以行動始，以思考終。再以有思考之行動始，以更高一級之融會貫通終，再由此而躍入真理之高峰。」[32] 經他改良的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教學法已然達於精熟境地。同年 7 月，陶行知以教學做合一，即中國本土化的專題研習教學法訓練學童，並正式推出更高研習層次的「幼年研究生制」，首次培養幼年研究生 30 名。中國本土化的專題研習教學法開始進入「斷語」的高峰。

綜觀上述，可知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教學法實建基於杜威的試驗主義及克伯屈的專題研習，最終根據中國本土國情有系統地演變而漸次獲得改良。至育才時期，陶行知復將教學做合一教學法用以栽育天才兒童，益見該教學法功能的突出，更奠定陶行知「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的地位。（參閱表 2）

（3）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實踐的論證

陶行知 1917 年帶著杜威的試驗主義返國，1919 年初嘗言「善試驗者立假設，擇方法，舉凡欲格之物，盡納之於軌範之中：遠者近之，微者大之，繁者簡之，雜者純之，合者析之，分者通之，多方以試之，屢試以驗之，更較其異同，審其消長，觀其動靜，察其變化，然後因果可明而理可窮也」[33]，實已蘊含「研究」的精粹。同年 10 月，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教育研究法〉，已將「研究」二字變成他的日常用語。1922 年，陶行知鼓吹將教育中的大問題分拆爲數十至數百個小問題加以研究，則大問題也不難解決，可見他對研究方法的重視。1926 年初，陶行知鼓勵科學教員每人「專研」一科；1934 年，他又說教員的研究要有「具體的題目」，其中心思想已接近「專題研習」的意義。

1939 年，陶行知在〈生活教育社社章〉中提到「研究專門問題」。到 1941 年，陶行知主張研究應從中小學做起，明確認同小學學童已有執行「專題研習」的能力。同年 8 月，陶行知在育才學校的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研究專題」的字眼，並明言研究的進行方法及研究報告的發表途徑；又規定老師進修外國語文與專題研究，要求「全體教師在年度內各選一適當問題加以研究，並擬定研究計劃，定期提出研究報告」[34]，這與克伯屈的「專題研習」已無太大分別。1942 年，陶行知鼓勵育才學生以「專一的問題做中心從事研究」，反映他已精熟專題研習的功效。到了 1946 年，陶行知要求上海小學教師進修時說，「程度較高者，宜從事專題研究，每人在一個專題上繼續不斷探討，到本題解決或有系統詳盡之報告，…才告一段落。」[35]。由此可見，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在本質和表徵上都與「專題研習」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參閱表 3）

---

32 《陶行知全集》卷 4，頁 489。

33 《陶行知全集》卷 1，頁 5-6。

34 《陶行知全集》卷 11，頁 924。

35 《陶行知全集》卷 4，頁 654-655。

（4）研究陶行知專家對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的認同

本研究立論的關鍵之一，是陶行知打從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實施的教育理念，是否就是「專題研習」在中國本土改良後的再實踐。除了上述兩點關於發展歷程和實質實踐的論證外，近代陶行知研究專家的意見能否認同也有客觀的價值。

在陶行知存世的學生中，年過百秩的王越教授力陳其師的教育是「創建適合時代前進的教育」；而周毅則說其師的「生活即教育」理論確從杜威而來[36]，這與中共前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李維漢所指「陶行知在教育上確是沿著杜威主義的道路發展」的說法無異。此外，陶行知學生貝堅在憶述當年育才學校上課時說：「當時由名家做專題演講之後，由同學參與討論，再匯報，在老師指導下，學生有甚麼疑問，那就去做社會調查，回校再綜合，再思考，再總結」[37]，顯然就是克伯屈「專題研習」過程的翻版。在近代陶行知研究專家學者中，牡丹江師範學院王華證明陶行知的教育理念等同「研究性學習」[38]，而陳仲豪、何國華、黎克明、孔棣華等教授的意見，都異口同聲表示陶行知當年的教育理念就是杜威和克伯屈「專題研習」的承傳[39]；陳仲豪稱之爲杜威的「教育中國化」[40]，而黎克明更認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對中國現代教育的本土化」有十分重要的意義[41]。可見在近代陶行知研究專家學者中，大都認同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實源於杜威的試驗主義和克伯屈的專題研習。

（5）推行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時代背景的擬似性

中國自清末實施新教育後，廢科舉、興學堂，初期所採取的教學法，大多模仿西方[42]。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隨著大批留學歐美的學者回歸，新教學法相繼傳入中國，並於 20 世紀 20 年代初興起一場空前的新教學法實驗熱潮[43]，局勢動盪不安。陶行知生於清末民初，正是新中國新舊教育交替改革之際。1925 年 12 月，陶行知在《新教育評論》創刊詞中云：「中國教育在萬難中奮鬥；有的禁不起過份的壓迫，歸於破裂；有的禁不起世俗的誘惑，歸於萎靡；有的愈敗愈戰，愈見其卓絕之精神。」[44] 情況與現時香港教育面臨「殺校」等等環境有點相似。及 1927 年，陶行知的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三月開學，卻是在戰亂的環境中創校的。依陶行知所言，「當時寧地戰事風雲正急，三路交通，俱已斷絕。

---

36 李炳坤《陶行知專題研習的教育理念分析與它對香港 21 世紀教育改革中專題研習的啓示》。

37 同上註。

38 王華〈論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現代教育價值〉，刊於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編輯部《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3 卷 2 期（2005），頁 92-93。

39 李炳坤《陶行知專題研習的教育理念分析與它對香港 21 世紀教育改革中專題研習的啓示》。

40 陳仲豪〈陶研事業的持續發展和開拓創新〉，頁 1-5。

41 黎克明〈弘楊陶行知現代教育思想和人格風範，爲推動新世紀廣東現代化事業而奮鬥〉，刊於廣東陶行知研究會編《廣東陶研》30 期（2005），頁 5。

42 畢誠、程方平《中國教育史》。

43 周險峰、張春紅〈陶行知與近現代教學法中國化〉，頁 78-83。

44 《陶行知全集》卷 2，頁 268。

而各同學冒危險，自上海、鎮江、安徽、浙江、江西相繼前來，本校遂得於槍林彈雨中如期開學。自開校迄今，屢經戰事及其他變故，故現在設備及其他一切，俱覺不很完備。」[45] 20 世紀 30 年代末，中日戰事爆發，整個中國教育事業更顯紛亂。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內戰隨之爆發，國內形勢仍然嚴峻複雜，加以物價飛漲，當時中國的教育事業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撇開戰爭的因素，20 世紀 20 年代初中國進行教育試驗的熱潮，與香港自 1997 年脫離英國統治回歸，教育改革正盛，努力試驗多種新教改方案的情況有點相似。而陶行知的「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教學法，亦是在相似的背景下孕育而成，給本研究選擇陶行知加添了一層說服力。

（6）推行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目標的一致性

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一書的主席序言中，鄭漢鈞博士開宗明義地說：「面對 21 世紀的挑戰，香港的教育要走向世界，我們的學生除了在課堂裡學習以外，更要走出學校。在課程要求方面，我們除了要學生學習知識之外，更要他們展開國際視野，學會學習，掌握可帶出學校、可於學校以外享用的終身技能，並養成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從而達到全人發展，終身學習的教育目標。」[46] 在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中，這些目標顯而易見。例如陶行知早在〈教學合一〉一文中，明言老師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生學。陶行知主張「社會即學校」，注重學校和社會事業的聯繫和合作，鼓勵學童接觸大自然和觀察社會現象以進行專題研習，稱這才是真學[47]。「學童觀察了事物如要改變之，就產生了疑問，形成了學知識之始；再看些書，把世界的事弄個明白，這就是學知識、廣視野」[48]。在教學方面，陶行知反對老師教死書而應教學生學，從而取得生活的技能和本領。在灌輸學童價值觀方面，陶行知側重言教與身教，例如藉周敦頤〈愛蓮說〉以喻君子不汙，又借王羲之〈墨池記〉以彰勤學，期學童受教而達至真善美之境[49]。可見陶行知 20 世紀 20 年代時的主張，已符合香港 21 世紀教育改革的目標。

（7）陶行知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的現代指導意義

陶行知 1927 年時以「教學做合一」爲校訓，創設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建立他底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教學法的橋頭堡，至今（2007）已有 80 年歷史。但是，陶行知所實踐的教育理念即使在 21 世紀的今天仍具現代指導意義，且看陶行知 1934 年在〈殺人的會

---

45 《陶行知全集》卷 2，頁 335。

46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序頁。

47 周洪宇編《陶行知研究在海外》。

48 潘冷雲、林力鋒等《現代生活與現代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啓示》（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 年）。

49 同上註。

考和創造的考試〉一文說到中國傳統教育時的話：「學生是學會考，教員是教人會考，學校是變了會考籌備處。會考所要的必須教；會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於必不教。於是唱歌不教了，圖畫不教了，體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農藝不教了，工藝不教了，科學的實驗不教了，所謂課內課外的活動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書，只是考的書，只是《會考指南》！ 教員等於讀書；讀書等於趕考。好玩吧，中國之傳統教育！ 」[50] 在區區 100 餘字中，不難發現這也正是今時今日香港教育予人詬病的地方。陶行知針對當時的情況對症下藥，提出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的教學法，對同樣環境底下的香港應有啓示作用。

汕頭市陶行知研究會陳仲豪教授說，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有著明顯的時代價值[51]。廣東省陶行知研究會會長黎克明教授也說，「陶行知的現代教育思想不單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不僅在當時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現在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借鑒作用。」[52]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系王祥教授亦云，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爲我國目前許多地區和學校正在進行的「新基礎教育」實驗、「新教育」實驗等提供了有效的理論指導。中小學教師要從過於注重知識傳授，轉向強調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使學生在獲得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的過程中，學會學習，學會生存，學會做人，形成正確的價值觀、良好的態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質。他更認爲，在現代社會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即將全面鋪開之際，重新審視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與實踐，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53]。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聯同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於 2006 年 5 月 13 日在香港首度舉辦「陶行知與近代中國」研討會，正好說明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在今日香港的現實指導價值。

陶行知專題研習的定義

陶行知 1917 年由美國學成返國至 1946 年逝世，努力實踐中國教育 30 年，以杜威、克伯屈的教育思想爲經，以中國當時國情發展的需要爲緯，發展了一套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的系統學說。1934 年，陶行知指導山海工學團學童就國外 20 架飛機參與飛行比賽做專題研習時，要求學童每天把中西文報紙剪下貼在簿上，參考地圖上並不統一的地名反覆推敲把飛行路線畫將起來，再查看英國沿途的殖民地，檢視英國空軍對維持殖民地的關係，以「進一步查出世界各國與中國空軍力量的比較，以及世界第二次大戰空軍所佔的地位。」[54] 然後，陶行知再給這次研習添了個做數學的機會，要求學童計算「從倫敦到墨爾砵有多

50 《陶行知全集》卷 3，頁 159。

51 陳仲豪〈陶研事業的持續發展和開拓創新〉，頁 1-5。

52 黎克明〈弘楊陶行知現代教育思想和人格風範，爲推動新世紀廣東現代化事業而奮鬥〉，頁 5。

53 王祥（2005）。

54 《陶行知全集》卷 3，頁 312。

少哩？等於中國里多少里？史考梯（參賽機師名）每小時平均飛多少里？倘使一個人要從倫敦走到墨爾砵（假使他也能在水面上走），每天走一百里，要多少日子走到？我們還預備做些簡單的實驗，看些書，追求飛機構造的原理及發明之史略。總之，我們拿這次比賽做中心，把歷史、地理、科學、算術、社會打成一片去幹。我們不要忘記，它也給了我們一個充分活用圖書的動機。我們也把國語和飛機比賽聯了起來。」[55] 無庸置議，這就是陶行知高挑戰性專研研習的典型，還把各種不同科目的課程統整貫串在同一個研習之中。上述這個例子，涵蓋專題研習的學習理論、課程中的題材及課程統整、教材、教法等，可視爲陶行知專題研習實踐系統的縮影。

歸納陶行知對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的理論與實踐，可以推斷他的專題研習，就是一個以學生爲主導，依學的策略及在指定時間內進行有關生活或對社會有貢獻的專題研究（個人或小組），在良師指導下先行試驗或真做，經疑難解難（透過資料搜集、調查分析等）、溝通協作、專家評鑑、力求創造而不斷反思、綜合斷語，建構新知識，達到跨學科自學及發展個人多元智能爲目標的過程。

表 1　陶行知年表（1891-1946）

年 份	陶行知重要紀事
1891	▪ 10 月 18 日出生於安徽歙縣黃譚源村
1908	▪ 入讀杭州廣濟醫學堂
1909	▪ 入讀南京滙文書院
1910	▪ 轉讀金陵大學文科，並任《金陵光》學報中文版編輯。
1914	▪ 以第一名畢業於金陵大學，負笈美國伊利諾大學學市政，一年後獲頒文學碩士學位，其畢業論文題爲〈中國租地〉（Leased Territories in China）。
1915	▪ 轉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
1917	▪ 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都市學務總監」資格憑 ▪ 回國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後輾轉任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南京安徽公學校長。 ▪ 另曾任《新教育》主編
1920	▪ 原呈交哥倫比亞大學考取博士學位的論文稿件〈中國教育哲學與新教育〉因南京高師火災被燬。
1921	▪ 任中華教育改進社主任幹事，後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編《平民千字課》，並於華中華東一帶推行平民教育。
1925	▪ 任《新教育評論》主編
1927	▪ 在南京創辦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後改名曉莊學校），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

55　《陶行知全集》卷 3，頁 313。

	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理論。
1928	▪ 指導創辦浙江湘湖師範
1929	▪ 獲上海聖約翰大學授予榮譽科學博士學位
1930	▪ 4 月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被查封，受通緝避難日本。
1931	▪ 返國後任上海《申報》總管處顧問，提倡兒童科學，發起「科學下嫁」運動。 ▪ 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組織國難教育社。 ▪ 另支持組織「新安旅行團」，倡導大眾歌曲及大眾唱歌團。
1932	▪ 先後創辦山海工學團、晨更工學團、勞工幼兒團。 ▪ 首創「小先生制」，成立中華普及教育助成會，開展「即知即傳」普及教育運動。
1936	▪ 當選「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委及常委 ▪ 任國民外交使節，出訪歐美亞非 28 國家（地區），歷時 2 年多。
1938	▪ 8 月回國途中抵達香港，倡辦「中華業餘補習學校」。 ▪ 12 月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被選爲理事長。
1939	▪ 在重慶爲難童創辦育才學校，因材施教，培育人才。
1943	▪ 發表〈創造宣言〉
1945	▪ 當選中國民主同盟中常委兼民主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主辦《民辦》星期刊，主編《民主教育》雜誌。
1946	▪ 1 月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任校長，提出「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於人民的幸福」。 ▪ 抗日戰爭勝利後，4 月返回上海，投入「反內戰、爭和平」運動，三個月內巡迴演講 100 多次。 ▪ 7 月 25 日因勞累過度逝世，享年 55 歲。
兒女	▪ 4 名

參考文獻：《陶行知全集》（1991）；任世杰、吳一德編：《學陶師陶一百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年）；周毅、金成林編：《創造奇葩——陶行知的弟子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年）。

表 2　設計教學法（即克伯屈「專題研習」）在中國 20 世紀初試行經過及陶行知將設計教學法改良成「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教學法」的演變歷程

年份	紀　事
1917	▪ 陶行知由美學成返國，就職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他反對中國傳統教育的瘤疾集中在方法論上。對於歐美的試驗主義教育方法推崇備至。其後他主張以源於杜威的教學法取代教授法。
1919	▪ 1 月 16 日，中華新教育共進社成立，刊行《新教育》雜誌，鼓吹教育革新運動。 ▪ 2 月，陶行知發表〈教學合一〉一文，提出三個重點：1. 先生的責任在教學生

	學；2. 先生教的法子必須根據學的法子；3. 先生須一面教一面學。其中心思想與杜威的「兒童中心教育觀」有一致性。 ▪ 將傳統的「教授法」更名爲「教學法」 ▪ 3 月，陶行知向國人宣傳杜威：「平民主義的教育目的，試驗主義的教學方法。」 ▪ 5 月 1 日，杜威來華巡迴演講。其後，陶行知開始提出「做」的概念，清晰地表達了「從做中學」的思想。 ▪ 7 月 22 日，陶行知講新教育的方法，在「（戊）注重啓發」一點，沿用杜威主張說，「教學生的法子，先要使他發生疑問；查出他疑難的地方，使他想種種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從這些方法之中，選出頂有成效的法子，去試試看對不對；如其不對，就換個法子，如其對了，再去研究一下。」可見陶行知此時仍熱衷推廣克伯屈的專題研習教學法。
1920	▪ 南京高師附小實驗設計教學法。其後江蘇附小聯合會議決推行，各地小學相繼效法。
1921	▪ 全國教育聯合會議議決推廣研究設計教學法，使之能推及於全國小學。 ▪ 12 月中華新教育共進社改組爲中華教育改進社，積極實驗新教學法。其中設計教學法與道爾頓制最受重視。中華教育改進社主任幹事陶行知其時認爲，設計教學法是當時實行活的教育的兩個最時髦法子之一，而道爾頓制是課堂組織最好的教學法。這兩種教學法本質上都有著「做」的特徵。
1922	▪ 陶行知進一步主張，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的法子要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要根據做的法子。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理論漸次成立；但其名稱尚未出現。
1923	▪ 設計教學法的實驗達到高峰，被認爲是「法良意美」，並認爲此法的試行，「舊時按時分班分科講授之定式，皆可變更矣。」 ▪ 秋季，南京東南大學附中主任廖世承發表〈東大附中道爾頓制實驗報告〉，指出實驗班成績稍遜於比較班。
1925	▪ 陶行知演講仍以〈教學合一〉爲題。後得張伯苓先生建議，才首稱「教學做合一」教學法。自 1917 年帶著杜威的理論回國，實踐 8 年之後，陶行知說「山窮水盡時才悟到教學做合一的道理」。 ▪ 廖世承再於〈東大附中道爾頓制實驗報告〉指出，實行道爾頓制最感困難的，就是經濟問題。要是學校經費不充足，教師人數不增加，就收不到道爾頓制的最大效果。 ▪ 8 月，陶行知說：「我們中國的教育向來是抄襲的。先是抄襲日本，後來又抄襲英、德、法，現在又抄襲美國。這種抄襲教育，簡直不是中國的教育，甚至不成教育。」教學改良之風吹遍全國。

1926	▪ 廖世承著文指出，「採用任何方法，當先問教育的目的是甚麼，何種方法能達到目的？不應當問：怎麼可以推行這種方法。」他更認爲當時教育界脫離中國國情，盲目推行外國教學法的做法是「本末倒置」。上海吳淞中學舒新城更認爲當時教育界忽視新教學法是否適合中國的教育而盲目採用，致使模仿而流於形式化及機械化。其後，教育界開始認識到，教學法改革必須從本國的教育實際需要出發，必須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 ▪ 12 月，陶行知「教學做合一」教學法的理論得到系統敘述：教的法子要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要根據做的法子；教法、做法、學法是應當合一的。
1927	▪ 陶行知正式提出「教學做合一」教學法，提出借鑑杜威的教育思想，重視教育和生活與社會相聯繫的道理。 ▪ 陶行知創辦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校訓即爲「教學做合一」。其後陶行知進一步把「教學做合一」教學法表述爲三個層次：「1. 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2. 對事說是做，對己說是學，對人說是教；3. 教育不是教人，不是教人學，乃是教人學做事。」 ▪ 7 月於創辦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期間，發表〈行是知之始〉一文。其概括「學」的規律爲：「行動生困難，困難生疑問，疑問生假設，假設生試驗，試驗生斷語，斷語又生行動，如此演進以至無窮。」至此，陶行知將源於杜威的專題研習教學法進一步改良。
1928	▪ 4 月，陶行知評價設計教學法時認爲此法比道爾頓制好，「就其精神說，它與教學做合一的道理也很相近。但既稱之爲教學，往往把做字忘掉。」可見教學做合一教學法是專題研習的改良。 ▪ 陶行知發展藝友制，「用朋友之道教人學做教師」，「先知先行的在做上教，後知後行的在做上學。」進一步肯定工師在「教學做合一」教學法上的重要角色。
1929	▪ 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理論，開始超越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教育思想；但承認沒有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理論在前，決產生不出「教學做合一」的理論。 ▪ 10 月，陶行知認爲西洋教育最好的是研究所和小學，覺得美國研究所的辦法的確是教學做合一。這是陶行知將「小學與研究結合」思想的發端。
1931	▪ 陶行知的「行知行」教育理念形成。
1932	▪ 9 月，陶行知在上海辦起山海工學團，實行「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原則，將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打破傳統學校的界限，實是「教學做合一」教學法施行的最佳環境。 ▪ 在隨後的工學團時期，陶行知發明了「小先生制」和「即知即傳」的原則，在這些教學實踐中總結了無數經驗和方法，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教學做合一」

	的理論體系，使得此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教學法更能適合任何經濟環境底下的教育發展。
1934	▪ 陶行知將 1910 年起沿用的名字「知行」改爲「行知」，明顯點出以「做」得到「知識」的真理。
1939	▪ 陶行知以生活教育原理與方法爲指導方針，創辦育才學校，進一步肯定天才兒童的存在，同時否定了教育上「不問學生興趣，盲目灌輸」的方法。
1941	▪ 陶行知的「行知行」教育理念已具體概括爲「人類和個人最初都由行動而獲得真知，故以行動始，以思考終。再以有思考之行動始，以更高一級之融會貫通終，再由此而躍入真理之高峰。」經他改良的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教學法已然達於精熟境地。 ▪ 陶行知以教學做合一，即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教學法訓練學童，並正式推出更高學習層次的「幼年研究生制」，首次培養幼年研究生 30 名。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教學法開始進入「斷語」的高峰。

參考文獻：《陶行知全集》（1991 年，1998 年，2002 年）；畢誠、程方平：《中國教育史》（台北：文津，1996 年）；湯才伯：《廖世承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年）；崔運武《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年）。

表 3　陶行知始稱「專題研習」的形成過程及其相關教學意念的詮釋

刊載日期	對「專題研習」相關教學意念的詮釋	原文題旨	卷	頁
1922/12/23	對教育**問題**，用分析的客觀的方法**研究**。將大**問題**分析爲數十數百個小**問題**，每一小**問題**至少有一人繼續**研究**辦理。如是，即大**問題**也不難解決了。	中華教育改進社周年社務報告	1	510
1926/3/26	本會設…三科，專供…科學教員之**研究**。每科**研究**時期爲四星期。每科定額六十人…對於**各項問題**，爲自由公開之討論…携帶…計劃大綱…會員必每人**專研**一科…其目的在使各種自然科學新近之進步或發明，以及社會或經濟之應用…	第二屆科學教員暑期研究會說明書	2	688, 689
1934/9	…引導…師生進一步**研究**東北…**研究**世界，每一個人認定一個小小的**具體的題目**，充分搜集資料，認真**研究**。人人可以做**研究**工作，師範生、中學生、小先生，都可以做**研究**工作。有了**研究**心得…互教互學…	陶行知致廣東大埔縣百侯中學程本海、朱澤甫的信	11	555, 556

1939/1/15	第二章 第三條…本社社務如下：…丁、**研究專門**問題	生活教育社社章	4	306
1941/7/23	朱振華（育才小**研究**員）調查材料一日之功幾乎成冊、益感培養小**研究**員之必要。認爲「大學階段是贅瘤，是陰消**研究**力」，主張「從中小學而跳入**研究**所，培養**研究**小助理或小**研究**員」。	陶行知年表	9	829
1941/8/29	四、**研究**部…甲…（一）總則：…6.在**問題研究**上加強學生**研究**力之培養…（二）具體工作：…4.導師各自選取**研究專題**，擬定計劃，定期完成**研究**…10.以導師**研究專題**爲基礎，編輯叢書至少 6 種。 乙、正式開始幼年**研究**生的培養…5.**研究**生每人選定**問題**加以**研究**，並須擬定具體**研究**計劃，定期提出報告，完成**研究**…8.**研究**生每星期集會一次，以討論治學方法，交換**研究**經驗，或作學術**問題**之討論。…9.**研究**生之**研究**報告…發表之辦法有三：a.在校內出壁報專刊；b.介紹到各報紙雜誌上發表；c. 介紹到曉莊研究所審核後，印成專刊。 丙、教師進修…2.開始**專題研究**——全體教師在本年度希望各選擇一適當**問題**加以**研究**，並擬定**研究**計劃，定期提出**研究**報告，現已分別選取**問題**著手進行。	育才學校 1941 年 8、9 兩月工作報告	11	921, 922, 923, 924
1942/7/20	荀子說：「好一則博」。這句話…因爲有了一個**專一**的**問題**做中心，從事**研究**，便可旁搜廣引，自然而然的廣博起來了…所以我希望有能力**研究**的先生和同學，必須擇定一個**題目**從事**研究**…我們**研究**學問有了**中心題目**，便要多多搜集材料…好細細**研究**。	育才學校三周年演講：〈每天四問〉	4	519, 520
1946/6/6	程度較高者，宜從事**專題研究**，每人在一個**專題**上繼續不斷探討，到本**題**解決或有系統詳盡之報告，…才告一段落。	和小學教師談話之三：〈教師自動進修〉	4	655

參考文獻：《陶行知全集》（1991 年，1998 年）。

陶行知研究近況及其展望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一）

近代中國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的生平言行和思想學說，在他生前死後尤其是近三十年來，一直備受國內外教育界人士重視，時至今日甚至成爲當前中國教育的指導思想之一。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展現了新的局面，隨著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提高，陶行知研究進入一個熱烈階段，且日益彰顯其時代意義。最近幾年間，有關研究更由中國內地擴展到香港、台灣等地區和海外（如日本），相信是繼蔡元培（1868-1940）之後，華人社區另一位較爲人所認識的中國教育家。

陶行知著作甚多，且散見各種大小報刊，搜集和整理需時，較完備的全集要在他逝世半個世紀後才大致編輯就緒。1981 年，陶行知誕辰 90 週年紀念大會在北京舉行；接著安徽、上海、江蘇、四川、北京等地，相繼成立了陶行知研究會。華中師範學院教育科學研究所主編的六卷本《陶行知全集》，1985 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礎上增訂的十卷本《陶行知全集》，於 1991 年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後補充了新收的材料，在體例不變的原則下，改正了若干錯字及註釋中的一些訛誤，並作出幾項調整，成爲十二卷本，於 2005 年出版。總計約八百萬字，包括論著、教材、英文著譯、詩歌和書信，另有相關圖片、手蹟，以及紀念文章、年表紀要等。（參閱附表）

附表　《陶行知全集》十二卷本目次

卷次 / 類別	主要內容
第 1 卷 / 論著	中國教育改造、集外文匯（1913-1924 年）、附錄
第 2 卷 / 論著	教學做合一討論集、齋夫自由談、集外文匯（1925-1931 年）、附錄

第 3 卷 / 論著	古廟敲鐘錄、普及教育、怎樣做小先生、普及教育續編、普及教育三編、中國大眾教育問題、集外文匯（1932-1936 年 4 月）、附錄
第 4 卷 / 論著	育才學校手冊、集外文匯（1936-1946 年）、附錄
第 5 卷 / 教材	教材、兒童讀物、附錄
第 6 卷 / 英文著譯	Treatises, essays, etc.; letters; stories, folk, tales, fables, myths and jokes; poems and songs; 論著及書信中譯、譯詩、譯文
第 7 卷 / 詩歌	知行詩歌集、續集、別集、三集、集外詩匯
第 8 卷 / 書信	知行書信、集外書信（1915-1940 年）、附錄
第 9 卷 / 書信、人名索引	集外書信（1940-1946 年）、附錄、人名索引
第 10 卷 / 衙備忘	上：第一冊至第二十三冊 下：第二十四冊至第五十五冊
第 11 卷 / 補遺一	補遺一、附錄、編後記
第 12 卷 / 補遺二、全集附錄	補遺二、全集附錄（紀念文章及大事年表等）

文選方面有三種最便應用：其一，是中國陶行知研究會編《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論和實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年）；其二，是方明編《陶行知教育名篇》（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5 年）；其三，是胡曉風、金成林、張行可、吳琴南編《陶行知教育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年）。此外，金林祥、張雪蓉編注《陶行知教育名著教師讀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收文章四十篇，並後面均有題解和注釋，可供學校教職員和教研工作者參考。

（二）

陶行知是安徽歙縣人，畢業於金陵大學，留學美國，1917 年回國後擔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1919 年發起成立新教育共進社，又在南京首創暑期平民夜校；1921 年受聘爲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同年成立中華教育改進社。其後從平民教育轉向生活教育和鄉村教育，1927 年曉莊學校的誕生是一個重要里程碑。1930 年代起，致力於抗日救國活動；抗戰期間宣揚戰時教育和大眾教育，曾三次到香港。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理論研究室編《陶行知年譜稿》（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 年），爲陶行知研究奠定了史實的基礎；朱澤甫編著《陶行知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年），內容有所訂正和補充。四

川省紀念陶行知先生誕生九十周年大會籌備組編《陶行知紀念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輯錄三十篇紀念性質的文章，爲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介紹陶行知生平事蹟的著作之中，童富勇、胡國樞著《陶行知傳——紀念偉大的教育家》（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1 年）較爲平實可讀。陶行知的出生年份有兩說，舊說一般認爲他生於 1891 年，此書就是爲了紀念他誕生一百週年而編寫的；新說認爲是 1893 年，《陶行知全集》十二卷本（2005 年）中附有胡曉風的〈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活動記略〉，力主此說，但仍未成爲定論。何榮漢著《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發現》（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4 年），闡述了陶行知與基督教的關係。

徐志輝、盧愛萍主編《吳樹琴與陶行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主要是關於陶行知與他第二任妻子吳樹琴（1916—2003）的生活記載和書信、照片等資料。袁晞著《陶行知：捧著心來，不帶草去》（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 年），則以大量插圖展示了陶行知的生平。

（三）

郭笙著《爲中國教育尋覓曙光——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 年），對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作了整體的介紹。他的教育思想體系向來最受注意，何國華著《陶行知教育學》（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有較全面的論述。書中首先論述陶行知的生平教育活動、哲學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特點和生活教育理論，然後介紹他對普及教育、幼兒教育、成人教育、職業教育、師範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看法，接著，逐一闡釋他在教師修養、學校管理、道德教育、科學教育、體育衛生、美育理論、勞動教育、創造教育、人才教育、家庭教育、教育評估等不同方面的見解。

較專門的著作，中國內地有兩種：一是《陶行知系列研究》江蘇課題組編《論陶行知師範教育思想》（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 年），探討他對師範教育的看法；另一是陳善卿、張炳生、辛國俊著《生活德育論：陶行知德育理論的研究與實踐》（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析述生活德育理論的產生、形成、發展及其當代價值。台灣方面，有江明淵著《民初陶行知、晏陽初教育理論與民間文學之關係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6 年），對陶行知、晏陽初（1890-1990）二人的教育事業和民間實踐作了具體比較。

現時最用力的專著，仍是日本學者牧野篤著《中國近代教育之思想的展開與特質——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之研究》（東京：日本圖書中心，1993 年）。此書內容分爲三部：（一）爲了實現「共和國」的「國民」論；（二）爲了「民族」解放的「大眾」論；（三）爲了「抗戰建國」的「人材」論。這三者充份說明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基礎、形成和展開，另有〈陶行知與日本〉一文亦很可觀。

至於最能反映眾多專家學者見解的，當推下列三種論文集：其一，是北京陶行知研究會編《陶行知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年），收文章七十多篇；其二，是廣東省陶行知研究會編《陶行知思想新探》（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89 年），收文章二十篇；其三，是周洪宇、余子俠、熊賢君主編《陶行知與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此書收錄「陶行知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三十餘篇，內容圍繞著陶行知的中外文化教育觀以及他對文化教育的貢獻等。文章編排分爲五類：（一）總論；（二）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觀；（三）陶行知與中西文化教育的關係；（四）陶行知的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五）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新時期的實驗與發展。

（四）

2006 年 5 月 13 日，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與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陶行知與近代中國」研討會，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地區的專家學者參與了討論，在會上宣讀的十多篇論文將結集於 2008 年出版，反映了香港學界對陶行知研究的重視。

2007 年 3 月 14 日，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江蘇省陶行知研究會、南京曉莊學院聯合舉辦「陶行知研究高層論壇」，使陶行知研究推上了另一個高峰。同年 5 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出版的《歷史與文化》第三卷，亦有「陶行知研究論壇」，凡此都說明了，有關陶行知討論的熱潮將興。

其實，自 1940 年代以來，海內外論述陶行知生平事蹟和思想學說的著作是很多的。周洪宇編《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和上海圖書館、麗水師專圖書館編《20 世紀陶行知研究資料索引》（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 年），已作了詳細而全面的整理和介紹；金林祥編《20 世紀陶行知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更是一冊論述深入且有條理的研究史。本文僅就最近出版的著作和研究概況予以補充，希望能夠引起海內外學界對這方面更多的注意。

附錄：有關陶行知的文獻著作

- 《行知詩歌集》，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 年；北京：三聯書店，1981 年。
- 朱澤甫選輯《行知詩歌選》，大連：光華書店，1948 年；華盛頓：中國研究資料中心。
- 生活教育社編《行知歌曲集》，北京：三聯書店，1949 年。
- 麥青著《陶行知》，上海：生活・讀書・新知書店，1949 年；香港：新中國書局，1949 年。
- 白韜（戴伯韜）著《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學說》，香港：新中國書局，1949 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 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年。

- 方與嚴編《陶行知教育論文選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 年；上海：上海書店，1996 年。
- 生活教育社編《陶行知先生四週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 年。
- 意林、微林著《愛滿天下》，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1 年。
- 陶行知著《陶知行行知文獻》，香港：龍文書局，1966 年。
- 〔日〕齋藤秋男《評傳陶行知：政治的抒情詩人の生涯》，東京：勁草書局，1968 年。
- 白韜著《回憶陶行知先生：其生平及其學說》，東京：龍溪書舍，1971 年。
- 陶行知著《陶行知的教育道路》（又名《古廟敲鐘錄》），上海：兒童書局，1933 年；陶行知資料編輯小組，1976 年。
- 《紀念陶行知先生文選》，南京：江蘇省教育學會，1981 年。
-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陶行知教育文選》，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 年。
- 江蘇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南京曉莊師範陶行知研究室合編《陶行知文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 年。
-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理論研究室《陶行知年譜稿》編寫組《陶行知年譜稿》，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 年。
- 四川省紀念陶行知先生誕生九十周年大會籌備組《陶行知紀念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 《行知歌曲集》，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 年。
- 《行知書信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年。
- 江蘇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紀念陶行知》，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年。
- 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陶行知一生》，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年。
- 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年。
- 金燕玉編《陶行知兒童詩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年。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碚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陶行知在北碚專輯》，北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碚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4 年。
- 四川省育才學校、社會大學校史研究學會重慶分會編《育彼英才：陶行知和育才學校在重慶》，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 年。
- 華中師範學院教育科學研究所主編《陶行知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1985 年。
- 朱澤甫編著《陶行知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年。
- 徐大文、劉大康著《陶行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年。

- 廣東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編《學習陶行知促進教育改革》，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85 年。
-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編《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年。
- 吳一德編《陶行知詩歌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年。
- 《陶行知先生紀念館簡介》，南京：江蘇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1985 年。
- 張達揚、李紅梅編《陶行知論普及教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年。
- 李楚材編寫《陶行知和兒童文學》，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86 年。
-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編《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論和實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年。
- 丁丁等編著《陶行知教育思想十二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年。
- 北京市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陶行知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
- 北京市陶行知研究會編《陶行知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年。
- 〔日〕齋藤秋男著，楊暢譯，蕭坤華校《陶行知評傳：政治抒情詩人的一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 年。
- 許宗元著《陶行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
- 周毅著《陶行知環行世界錄》，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 年。
- 太原市陶行知研究會編《太原市陶行知研究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年會會刊》，太原：太原市陶行知研究會，1988 年。
- 廣東省陶行知研究會編《陶行知思想新探》，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89 年。
- 賈培基著《陶行知》，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年。
- 袁振國、張癸編著《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上海陶行知紀念館編《一品大百姓：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中國陶行知紀念會編《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論和實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童富勇、胡國樞著《陶行知傳：紀念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誕辰一百周年》，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1 年。
- 潘冷雲著《現代生活與現代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啓示》，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 年。
- 胡國樞著《生活教育理論：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陶行知系列研究》江蘇課題組編《陶行知師範教育思想實踐》，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陶行知系列研究》江蘇課題組編《論陶行知師範教育思想》，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徐匯區教育局編著《陶行知教育思想實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 年。
- 周毅、向明著《愛滿天下：陶行知文學傳記》，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董寶良主編《陶行知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郭笙著《爲中國教育尋覓曙光：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江蘇省陶行知研究會編《陶行知日誌》，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合川生活教育整體改革領導小組《陶行知教育思想與合川教育整體改革》，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周洪宇編《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002 年。
- 蕭凌主編《陶行知與湘湖師範》，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 年。
- 《陶行知論德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 年。
- 章開沅、唐文權著《陶行知：平凡的神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年。
- 魏心一主編《陶行知、黃炎培、徐特立、陳鶴琴教育文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年。
- 〔日〕牧野篤著《中國近代教育の思想的展開と特質：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の研究》，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3 年。
- 董寶良主編《陶行知教育學說》，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 年。
- 方與嚴著《方與嚴教育文集：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年。
- 邵丹編著《人生處處有真情：陶行知家書》，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 年。
- 何國華著《陶行知教育學》，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余子俠著《山鄉社會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 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編《陶行知手迹》，杭州：華寶齋書社，1999 年。
- 張民生主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與實踐》，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0 年。
- 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麗水師範專科學校圖書館編《20 世紀陶行知研究資料索引》，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 年。
- 陶行知著，郭玉卿、裴躍進編《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文選》，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年。
- 周毅、金成林編著《創造奇葩：陶行知的弟子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年。
- 徐明聰編著《陶行知評傳》，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
-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協會《民主之魂：陶行知的最後 100 天》，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 王一心著《勞謙君子陶行知》，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何榮漢著《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發現》，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4 年。
- 鄒尚智著《陶行知素質教育思想研究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 金林祥主編《二十世紀陶行知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
- 王建華主編《新課程與陶行知教育思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 年。
- 胡曉風等編《陶行知教育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年。
- 江明淵著《民初陶行知、晏陽初教育理論與民間文學之關係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6 年。
- 李剛著《歷史與範型：陶行知研究的知識社會學考察》，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 袁晞著《陶行知：捧著心來，不帶草去》，大象出版社，2007 年。
- 《紀念陶行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1891-1991》，重慶。
- 延安新教育學會選編《行知教育論文選集》，華盛頓：中國研究資料中心。
- 方與嚴著《大眾教育家與大眾詩人》，華盛頓：中國研究資料中心。
- 陶行知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陶行知先生紀念集》，華盛頓：中國研究資料中心。
- 潘開沛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華盛頓：中國研究資料中心。
- 陶冶選編《行知紀念冊》，華盛頓：中國研究資料中心。

陶行知與吳樹琴的姻緣
——兼評徐志輝、盧愛萍主編《吳樹琴與陶行知》

丁　潔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一)

陶行知（1891-1946）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出生地安徽歙縣——即古時的徽州，是出過朱熹、戴震的文化之邦。他幼年就讀於歙縣的鄉間私塾，受到的是傳統的經典教育。1906 年 15 歲時，入歙縣城的教會學校崇一學堂免費讀書。崇一學堂於 1900 年開設，學制三年，雖是教堂辦的學校，但並不進行基督教義的教育。開設的課程有英文、國文、中國史、西洋史，教學、理化、醫藥、地理、音樂、體操等。陶行知畢業後考入杭州廣濟學堂，立志學醫，但因這所教會學校對非基督教徒的歧視，他憤而退學。1909 年，在崇一學堂校長英國人唐進賢的介紹下，陶行知考入南京匯文書院預科（附中，即今金陵中學）。第二年春，匯文書院與宏育書院合併，成立金陵大學，陶行知於秋季即直接升入金陵大學文科本科就讀。功課之外，他還熱心公益、關心時事，積極參加社會活動。

1914 年 9 月 22 日，陶行知進入美國伊利諾斯大學的研究院攻讀市政，這時的同學中有孫科。經過一年苦讀，獲得伊利諾斯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15 年 9 月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校，在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祿門下攻讀教育。其原因主要在他深信：沒有真正的公眾教育，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此時他的同學中便有胡適。陶行知在哥倫比亞大學兩年寒窗苦讀，獲得「都市學務總監資格」文憑，之後若要獲得博士文憑，需回國搜集資料完成一篇博士論文。陶行知回國之初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時，完成博士論文《中國教育哲學與新教育》，但不幸毀於該校的一次火災中。其後他獻身於人民教育，再也無暇寫個人的博士論文了。

陶行知回國後，1917 年 9 月應聘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自此開始了長達 30 年的教育生涯。在第一個十年裏，他反對舊式教育，主張教育改革，進行辦學實驗，推行平民教育。在南京高等師範，他先當教員，1918 年起任教務主任。1921 年南京高師併入剛建立的東南大學，他任東南大學教授、教育科主任、教育系主任。同年 12 月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他出任主任幹事，並任該社《新教育》雜誌主編。陶行知很早開始就旗幟鮮明地反對「沿

襲陳法」、「異型他國」的教育，主張採用試驗主義教育方法進行教育改革。歸國不久即結合實際，撰寫〈教學合一〉，主張把「教授法」改爲「教學法」。1919 年擔任教務主任後，便把教學法在南京高師全面推開，且很快傳到其他學校並輻射到各地，全國大、中、小學紛紛仿效。他還促進南京高師改革招生制度，與北京大學相約，正式招收本科女生，可說是我國大學最早開放女禁的實行者之一。爲提倡新教育，在「五四」運動前夕，陶行知與胡適等一道，代表北京大學、南京高師、新體育社等團體，邀請美國教育家杜威來華講學；其後又於 1921 年 9 月，邀請美國著名教育家孟祿來華講學。杜威、孟祿的來華講學，傳播介紹了西方新的教育思想，陶行知是積極籌備者、促成者。

1923 年開始，陶行知把主要精力投入平民教育運動，他爲「平民教育」下了定義：平民教育是平常人的教育，這種教育要用最少的時間、最少的經費教導年長的人民識字、讀書，愛國、做好人，而且要叫所有的人平民化。爲推行平民教育，他辭去東南大學教育系主任之職，放棄了每月 400 塊銀元的高薪，全身心投入平民教育運動。從 1923 年秋季開始，他風塵撲撲奔走於全國十幾個省市，把平民教育輸入到工廠、農村、軍隊、旅店、廟宇，甚至監獄中去。他創造出連環讀書法，開辦了平民讀書處，身體力行，在家中辦了「笑山讀書處」，還促使梁啓超、胡適、熊希齡等京中名流都在家中辦起讀書處。幾年時間裏，在陶行知的積極宣導和四處奔走下，平民教育推行到全國 20 個省區。

「五四」運動後，陶行知繼續從事平民教育運動，創辦了曉莊師範。這是一所以培養農村教師爲目標的新型師範學校。曉莊師範根據農村的特點，按照他創立的「生自學成才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和「教學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論組織學校活動。學校不分班級，也無上下課制度，分設五種教學做：一是中心小學校工作教學做；二是教務政教學做；三是征服自然環境教學做；四是改造社會環境教學做；五是學生生活教學做。他把教育與生活、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學員在指導員指導下生活，在做上教，在做上學。陶行知辦曉莊師範，主張辦成「自由園地」。曉莊學校有中共地下黨、團組織，師生們參加反帝愛國鬥爭，積極支持下關工人罷工，他都予以大力支持。1930 年 4 月，國民黨政府以「勾結叛逆，陰謀不軌」爲藉口，武力封閉曉莊學校。陶行知被通緝，只好臨時避難日本。

1931 年春，陶行知返回上海，任《申報》總管理處顧問，對當時《申報》的革新起了相當作用。爲了普及科學知識，培養科技人才，他在《申報》總經理史量才資助下，聯絡了一批從歐美留學回國的專家，如丁柱中、高士其等，以及部分曉莊的師生，展開了「科學下嫁」運動，力圖把科學知識普及到農家大眾中去。這時陶行知在教育實施上的重要成果是創辦工學團。1932 年 10 月，他在上海寶山大場地區創辦了「山海工學團」，其宗旨是「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山海工學團以招收農民子弟爲主，「來者不拒，不來者送上門去」，邊勞動邊學習。工學團教農民科學種田，相繼辦起了「棉花工學團」、「菜園工學團」、「養魚工學團」等。學校參加社會改造，實施軍事、生產、科學、識字、民權、節育六大訓練，以便造成中華民族的健全分子。1934 年 1 月 28 日，山海工學團召開普及教育總動員大會，陶行知在會上正式提出「小先生制」。之後，他寫了〈小先生〉等文章，

作爲普及教育的方法加以推廣。由於「小先生制」適合普及教育的需要，很快在國內 23 個省市的普及教育中得到推廣，還對東南亞一帶的普及教育產生很大影響。山海工學團從成立到抗日戰爭爆發被迫暫時停辦，共存在了近五年的時間。1934 年，陶行知寫詩曰：「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在這年 7 月 16 日出版的《生活教育》雜誌中，他第一次把自己的名字「陶知行」改爲「陶行知」。

（二）

「九・一八」事變後，陶行知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1936 年，當選爲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7 月，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聯合發表《團結禦侮宣言》，毛澤東覆信表示支持；接著，受全國救國聯合會的委託，擔任國民外交使節，赴倫敦參加了世界新教育會議第七屆年會，在會上作了《中國救亡運動與小先生普及大眾教育運動實踐情況》的專題報告。9 月，陶行知代表中國全國救國聯合會，出席了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在這個有 4,000 名代表參加的盛會上，作爲中國代表團主席，他報告了日本的罪行和中國抗日的概況，博得各國代表的贊許和同情。隨後，在國外進行了廣泛的訪問募捐活動，所到之處發表演講，介紹抗日形勢，揭露日本罪行，在歐美各國建立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在兩年零一個月的時間裏，陶行知七赴美國，五赴英國，四赴加拿大，三赴比利時、德國、錫蘭（斯里蘭卡），兩赴法國、埃及、印度、新加坡，去過一次的地方計有墨西哥、愛爾蘭、捷克、荷蘭、瑞士、義大利、奧地得、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希臘、巴勒斯坦、黎巴嫩、越南等，共 28 個國家、地區，總行程達 25 萬公里。

1938 年 8 月 30 日，陶行知從國外返抵香港。他對媒體和各界人士發表了歸國三願：一是創辦曉莊研究院，培養高級抗戰建國人才；二是開辦一所難童學校，培養人才幼苗；三是在香港創辦職業補習學校。同年，他再赴香港之時，宣導興辦了中華業餘學校，親任學校董事長，吳涵真任校長官，這是一所專爲失學失業而有志長進的青年開設的夜校，授課的專家有胡愈之、茅盾、歐陽予倩、薩空了、樓適夷等。1939 年 7 月，陶行知在四川重慶附近的古聖寺爲兒童創辦育才學校。他明確規定了辦學宗旨，即「用生活教育之原理與方法，培養難意之優秀兒童，使之成爲抗戰建國之人才」。育才學校招生要通過智力測驗、文化教室、特殊才能考察，三方面綜合擇優錄取。根據學生特殊才能，入學後分別編入六個組：文學組、自然組、社會組、音樂組、繪畫組、戲劇組（後又添加舞蹈組、普通組）。同陶行知教育生涯的之前兩個階段——曉莊時期、山海時期相比，育才學校更爲重視基礎知識教育。陶行知要求育才學生牢牢掌握國文、數學、外語和科學方法這「四把鑰匙」。育才亦重視學生的創造才能，鼓勵學生創造性學習。陶行知在育才開展了「創造年」、「創造月」活動，並於 1943 年 11 月發表了著名的《創造宣言》，提出教育的理想境界：「和處是創造之地，天天是創造之時，人人是創造之人。」

1945 年，陶行知當選爲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1946 年 1 月，受南方局負責人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等托請，陶行知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推行民主教育。這是所文科性業餘大學，以晚間學習爲主。陶行知任校長，李公樸爲副校長兼教務人。一大批進步學者應聘、應邀到社大任教，有翦伯贊、許滌新、華崗、鄧初民、章乃器、張友漁、馬寅初、侯外廬、何其芳、艾蕪、胡風、曹靖華、聶紺弩、駱賓基等。與此同時，陶行知發起了社會大學運動，這表明他的普及教育已由普及識字教育、初等教育發展到普及高等教育。

抗日戰爭勝利後，隨著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政治中心東移，陶行知準備把育才遷往上海，並在上海推廣社會大學運動。1946 年 4 月 10，他偕夫人告別了居住七年的陪都重慶，先飛南京，拜訪了周恩來，4 月 18 日到達上海。陶行知回到上海後，立即投入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爭和平的鬥爭。1946 年 7 月 11 日和 15 日，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遭特務暗殺，全國爲之震驚。陶行知悲憤至極，在得知自己被國民黨特務列入暗殺名單第三名後，置生死於度外，對勸他注意安全的郭沫若、翦伯贊說：「我等著第三槍。」他自知處境危險，隨時可能犧牲，就開始整理自己的詩稿，天天工作到深夜。7 月 16 日，陶行知給育才師生寫了兩封信。7 月 22 日，他參加了鄒韜奮靈柩安放儀式，宣讀祭文。7 月 23 日，他與沈鈞儒、吳晗等十幾位民盟領導人一道開會，商量如何編印李公樸、聞一多紀念集。晚上又趕赴郭沫若寓所，聽取周恩來關於時局的分析。7 月 24 日，陶行知操勞了一天。這時憲兵已搜查了他的住所，他不得不臨時借住到朋友任宗德家中。是夜，他整理詩稿數萬字，工作至淩晨。7 月 25 日清晨，由於勞累過度、健康過虧、刺激過深，陶行知突發腦溢血，而常備藥物尚在家中，不及救治，溘然長逝，年僅 55 歲。

（三）

陶行知先後共有兩任妻子，第一任妻子是汪純宜。汪純宜與陶行知於 1913 年結婚，生了陶宏、陶曉光、陶剛和陶城四個兒子。1930 年國民黨武力封閉曉莊師範之時，汪純宜由於受到刺激和驚嚇，得了精神分裂症，其後一直在醫院療養，直至 1936 年於上海病逝。吳樹琴是陶行知的第二任妻子，1939 年底與陶行知結婚，陪伴他度過了人生的最後階段。

吳樹琴（1916-2003）生於安徽休寧縣的一個傳統大家庭中，她幼年時在休寧縣溪頭村的一間私立小學讀書，畢業後考上了安徽屯溪隆阜四女中，初中畢業後又進入了該校的師範班。1934 年，吳樹琴師範畢業後，決意要上大學，便與兩位女同學一起到了南京，借住在南京安徽公學校長姚文采的家中。之後，她們被安徽大學錄取，因安徽大學是三類學校而不願意去。姚文采便介紹她們去上海找他的同鄉好友陶行知。在陶行知的安排下，吳樹琴等三人進入上海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學校學習。這便是吳樹琴與陶行知相識的緣由。之後，吳樹琴在學校學習之餘，也常去參觀陶行知主辦的工學團和小先生開辦的學校，參加他的演講會，傾聽他的講學，瞭解他的教育理念，感受他的人格魅力。在完成大學第一學

年的學業後，由於家裏不肯再支付學費，吳樹琴一度考慮放棄學業。這時，陶行知伸出了援手，之後一直替她支付學費，使吳樹琴得以順利的完成學業。在這段時期，吳樹琴與陶行知之間的感情僅止於友誼階段，或者說吳樹琴更傾向於將陶行知看作是一位師長。他們之間的感情迅速升溫是在陶行知自 1936 年起至 1938 年以民間外交使節的身份出訪歐美亞 28 國這段時期。其間，他們雖未見面，卻鴻雁傳書，你來我往，向對方敍述學習、工作和生活上的趣事和煩惱，傾訴內心的情感以及思念對方之情，從而增進了相互間的瞭解，促進了心靈上的貼近。而且，陶行知在國外期間也沒有放棄對吳樹琴在學業上的資助。

1938 年 8 月，陶行知自國外返抵香港，這時也恰逢吳樹琴自大學畢業。陶行知曾在信中要求與她在香港會面，但吳樹琴因爲家庭和工作方面的考量，未能成行。這之後，吳樹琴在上海的一間中西藥房做配方的工作，但她對這份工作並不滿意。吳樹琴學習的是藥學專業，她理想中的工作是在藥廠做化驗或研究，藥房的工作既枯燥、繁重，責任又巨大，且沒甚麼前途，令她不得不考慮另謀出路。陶行知對此也甚爲關注，1939 年他擬在香港興辦生活教育社曉莊研究所，特致信吳樹琴，聘請她爲藥物研究助理。吳樹琴便離開上海趕赴香港。不料，由於日本的侵略，香港的災民問題甚是嚴重，陶行知將辦學經費捐出以賑濟災民，辦學計劃就此落空，吳樹琴的工作也沒有了著落。好在沒過多久便迎來了國共合作，國民黨對陶行知的通緝因此解除，他得以回到內地辦學。

1939 年 2 月，吳樹琴跟隨陶行知到重慶北碚。隨後，陶行知便多方籌措資金，創辦了育才學校和曉莊藥物研究所，吳樹琴就留在研究所工作。當時，北碚地區瘧疾流行得很是厲害，治療瘧疾的藥奎寧不但緊缺，且價格昂貴。爲了救治廣大的老百姓，陶行知要求吳樹琴研究治療瘧疾的中藥，並同她一起尋找秘方。吳樹琴按照尋找到的秘方，製成治療瘧疾的中藥水，分送給附近的老百姓服用，效果很好，隨後便有老百姓不斷上門求藥。但也有人反映，藥水太苦，服用後易導致嘔吐。於是吳樹琴便經過不斷的試驗，將藥水濃縮成半流動的藥膏，再加入輔助性的藥粉，製成中成藥丸，並命名爲「治瘧丸」。

陶行知與吳樹琴在共同工作中感情日漸深厚，兩人於 1939 年底決定結婚；12 月 31 日，他們的婚禮在育才學校舉行。1940 年 1 月初，夫婦二人去到重慶沈鈞儒的家中，郭沫若、胡愈之、李公樸等十幾位好友趕來祝賀，馮玉祥將軍則差人送來一對懷錶，上刻「共同奮鬥」四個字，以示祝賀。婚後至 1940 年 8 月，吳樹琴繼續在曉莊藥物研究所工作。1940 年 9 月起至 1942 年 7 月，吳樹琴在育才學校擔任校醫和衛生工作。其間，她也幫助陶行知做翻譯和抄寫，並共同翻譯了多首英語詩詞。其後由於育才學校的教育經費緊張，爲了給陶行知減輕負擔，吳樹琴自 1942 年 9 月起，開始在重慶北碚北溫泉新亞藥廠工作。在藥廠工作期間，她住在藥廠的宿舍，再次與陶行知分隔兩地，兩人又開始了鴻雁傳書的生活。他們以信件記錄各自的生活，相互依賴，相互交流，相互支持，相互關心。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 1945 年 10 月，吳樹琴與廠方發生分歧，從而回到育才學校，與陶行知團聚。

抗日勝利後，國共合作漸告破裂，育才學校也開始受到國民黨的打壓。鑒於這種情況，陶行知開始考慮將育才學校遷往上海。1946 年 4 月，吳樹琴陪同陶行知離開重慶去到南京。在南京，他們一同前往曉莊小學，受到曉莊師生的熱情歡迎。隨後他們轉到上海，借住在許士騏的哥哥許得勝家中。在上海三個月期間，陶行知一方面籌劃育才學校遷校事宜；一方面四處演講，宣傳民主和反內戰。7 月 15 日，昆明傳來聞一多和李公樸被暗殺的噩耗。陶行知對此萬分地悲痛和憤慨。爲避免危險，陶行知與吳樹琴分開，借住於任宗德家中，徹夜整理書稿。7 月 25 日，陶行知終因勞累過度，突發腦溢血，於任宗德家中溘然長逝。吳樹琴悲痛不已，揮淚作詩悼念亡夫。

陶行知逝世後，吳樹琴曾先後在中央大學、南京大學任醫師，還曾任江蘇勞動局副局長、南京制藥廠副廠長，曾多次受到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接見。1952 年，她與中央大學同事盧溫再婚，生了兒子盧界平和女兒盧愛萍。雖然吳樹琴再婚了，但她與陶行知的兒子等人仍有聯絡，感情甚好，陶盧兩家常有來往。此外，吳樹琴還積極投身陶行知研究活動中，利用種種機會和場合宣傳陶行知精神和教育理念；擔任眾多陶研機構或組織的顧問、理事；參與出版《陶行知全集》；爲陶研捐款和捐獻文物。吳樹琴從未中斷過紀念、宣傳和研究陶行知，直至 2003 年 12 月去世。

（四）

《吳樹琴與陶行知》一書，由陶研專家徐志輝和吳樹琴的女兒盧愛萍共同主編，2006 年 10 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錄了吳樹琴生平日記選編、遺文、年表，吳樹琴與陶行知之間的通信，親屬及陶友的紀念文章等，還有幾十幅珍貴的照片。全書分四個部分：第一篇〈非凡的生涯〉，介紹了吳樹琴的生平，包括有吳樹琴的自傳，南京製藥廠在她逝世後對其作的生平介紹及她女兒盧愛萍所作的吳樹琴年表，從而透過她自身、親人、昔日同事之口，客觀全面地敍述了吳樹琴的一生。第二篇〈兩地書〉，收錄了吳樹琴和陶行知之間的書信。這些書信主要分兩個時期，一是陶行知出訪歐美亞期間，即 1936-1939 年，透過這時期的書信既可以瞭解陶行知出訪時的行程和生活，亦可以看到他與吳樹琴愛情萌生至日漸深厚的過程，可以看到陶吳二人作爲普通人陷於愛情之中時，時而喜悅，時而甜蜜，時而彷徨，時而猶疑的心情，頗有趣味；二是兩人婚後於重慶分居兩地時期，即 1940-1945 年，透過這時期的書信可以窺得陶行知開辦育才學校的情況，以及陶吳夫婦二人在工作學習上相互幫助，生活上相互扶持的情況。第三篇〈吳樹琴遺文選〉，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吳樹琴早年日記摘編，選編了她早年在重慶北碚育才學校時期，主要是 1941 年 5 月至 1945 年 3 月，與陶行知共同生活、工作的有關日記，記錄了當時他們生活工作的一些細節；二是吳樹琴遺作，主要是她爲紀念陶行知所作的一些詩歌和相關的回憶文章、於各地演講時的講稿和早年的一些翻譯作品。第四篇〈懷念篇〉，包括三部分，一是親屬們所作的追思吳樹琴的文章；二是爲吳樹琴而作的詩文；三是紀念吳樹琴的文章選編。

關於陶行知的研究資料及研究著作相當多，研究資料有陶行知的文集文選、陶行知寫給兒子的書信集、陶行知的年譜、山海工學團史料等；研究著作則涵蓋陶行知的生平、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平民教育、兒童教育等教育活動和理念、陶行知與文學詩歌、陶行知與民主等方方面面。《吳樹琴與陶行知》一書則獨闢蹊徑，從陶行知的妻子吳樹琴女士入手研究陶行知，編撰了一冊關於吳樹琴和陶行知研究的資料匯總，其中吳陶之間的部分通信、吳樹琴的日記等，都是首次發表。透過這些資料可以看到陶行知與吳樹琴普通而又不普通的愛情及夫妻生活，對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與活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收藏價值。

中國古代捶丸的起源和發展

文兆堅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中國球類運動發展源遠流長。在漢代時期，蹴鞠已經產生。及至宋代，新一項球類運動——捶丸在中國誕生。捶丸於宋、元、明三代盛行，甚至曾出現西方高爾夫球源於捶丸的說法。本文說明捶丸的起源、玩法及其盛衰過程，並且論析它與高爾夫球之間關係，藉此增進對捶丸的認識。

一、捶丸的起源與玩法

捶丸是由唐代步打球（類似現在曲棍球）演變出來的。根據宋人筆記記載，五代與北宋初年，人們已進行類似捶丸的活動。魏泰的《東軒筆錄》有以下一段故事：南唐時候，縣令鍾離君安排婢女陪他的女兒出嫁。有一次，婢女對著庭園中一處硬地哭泣，被鍾離君發現，查問哭泣原因。婢女說因回憶當年父親以這塊土地作爲球窩，與她進行玩耍所致。此外，范公偁的《過庭錄》收載有關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 年）的故事。范仲淹外甥喜愛玩擊角球，玩耍時被范氏發現，他怒氣沖沖，命人用鐵槌將球擊碎。捶丸比賽場地有若干球窩，婢女與父親進行的球類運動亦有球窩。范仲淹要用鐵槌才能擊碎角球，可見角球相當堅硬，而捶丸所使用的球也十分堅硬。捶丸的特徵不約而同在婢女、范仲淹外甥所玩的球類運動出現，因此捶丸的雛形可能在五代與北宋初年已經形成。[1]

元世祖（奇渥溫忽必烈，1215-1294 年；1260-1294 年在位）至元十九年（1282），寧志齋老人撰寫《丸經》一書，說明捶丸比賽場地、用品、比賽方式與遊戲規則。捶丸的比賽場地不拘，平地、凹凸地或斜坡皆可。球場上有若干球窩，球窩左旁豎立一面彩色旗。除球窩外，還有稱爲「基」的擊球點。基與球窩的距離，最近是一丈，最遠者可以是 50 至 60 步，不過不可以超過 100 步。用品方面，捶丸的球由贅木製成。贅木是樹木上受病變增生的囊形物，又稱樹疙瘩。樹疙瘩上要有幾個眼，無眼者容易裂開。《丸經》稱以贅木爲球，原因是「贅木爲丸，乃堅乃久」。而捶丸所用的球棒有三種：撲棒、杓棒與攛棒，

1 劉秉果、張生平編：《捶丸：中國古代的高爾夫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6-7。

分別是打遠球、高球與地滾球時使用的。秋冬時採木製造，因當時是木最堅硬的時候。捶丸的比賽方法分爲團體與個人賽。由五人、四人或三人組成一隊，分別稱爲大會、中會或小會。每人可打三棒，其中一棒能將球打入球窩，可以獲得一籌。大會、中會或小會要得到 20、15、10 個籌才能取勝。此外，捶丸亦訂立多項比賽規則，要求參賽者嚴格遵守。[2]

二、捶丸的盛衰過程

捶丸盛行於宋、元、明三代，尤受貴族歡迎。據《丸經》記載，宋徽宗（趙佶，1082-1135 年；1110-1126 年在位）、金章宗（完顏璟，1168-1208 年；1189-1208 年在位）皆喜愛捶丸，二人對捶丸器具甚爲講究，均「盛以錦囊，擊以彩棒，碾玉綴頂，飾金緣邊」。其後蒙古人入主中國，建立元朝，亦沉迷捶丸，更因過份沉迷而荒廢政事。及至明代，捶丸仍在統治階層流行。在明代宮廷畫《宣宗行樂圖》長卷中，描繪了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 年；1425-1435 年在位）與其侍從進行捶丸的情況。由於進行捶丸期間，沒有激烈的身體碰撞，身體嚴重受傷機會甚低，而且可以使到精神愉悅，身體更加健康。這些優點促使捶丸在王室貴胄中流行起來。然而踏入清代，捶丸逐漸式微。清朝由中國東北滿洲人建立。滿洲貴族喜愛騎射、狩獵、滑冰與摔跤，對捶丸不感興趣。捶丸缺乏貴族支持，失去了發展基礎，無可避免地陷於沒落。[3]

三、捶丸與高爾夫球的關係

中國體育史研究先驅郝更生（1899-1975 年）的英文論著《中國體育概論》（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中，稱捶丸是「中國的高爾夫球」。4捶丸與西方高爾夫球的關係，漸漸吸引中國大陸其他學者進行探討。他們皆認爲高爾夫球源於捶丸。唐豪（1897-1959 年）根據法國漢學家的中國羅盤、火藥、印刷術等在蒙古西征後由中國傳入歐洲研究，推論捶丸與它們一樣，在元代時候東傳歐洲。[5] 唐豪亦透過比較捶丸與高爾夫球，說明高爾球源於捶丸。他說：

---

2 同上，頁 18-26；林伯原：《中國體育史》（台北：五洲出版社，1996 年），頁 320。

3 同註 1，頁 30、39；林伯原：《中國體育史》，頁 320。

4 凌洪齡：〈捶丸和高爾夫的對比與它們之間的關係〉，劉秉果、張生平編：《捶丸：中國古代的高爾夫球》，頁 134。

5 唐豪：〈我國古代某些球類運動的國際影響〉，中國人民共和國體育運動委員會編：《中國體育史參考資料》（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58 年），第 3 輯，頁 49-50。

> 我國的捶丸為歐洲高爾夫球的前身，不僅這些史料可作佐證，同時還可以從捶丸和高爾夫球本身三個基本特徵來考出。第一個特徵是：兩者都用球穴競賽。第二個特徵是：兩者都用球杖擊球。第三個特徵是：兩者所用的球杖基本上相同。[6]

另一位學者凌洪齡除闡明捶丸、高爾夫球在設備製作、遊戲方法和規則各方面的相似地方外，並且指出捶丸誕生遠較高爾夫球早五百年，進而認爲「根據捶丸的悠久歷史年代，根據《丸經》的早期公布於世，根據高爾夫和捶丸在內容上有廣泛的一致性，我們應當確認高爾夫球和捶丸是有著緊密血緣關係的」。[7] 除中國學者外，西方學者也參與討論，認爲中世紀末葉絲綢商人將捶丸由中國帶進歐洲。[8]

上述各人雖然致力證明高爾夫球源於捶丸，但是他們說法有待商榷。首先，他們缺乏實際證據，證實西方高爾夫球的形成是受到捶丸影響。唐豪雖引用法國漢學家的研究成果，然而法國漢學家對捶丸卻沒有提及。唐氏以他的研究作爲證據，說服力頗爲有限。其次，大陸學者竭力闡明捶丸、高爾夫球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欠缺說明捶丸東傳歐洲的具體經過，兩者相似可能是巧合而已。由於中外學者分別對捶丸、高爾夫球有深入認識，日後探討這方面問題，應該是中西學者一起合作，共同進行探索。

四、結　語

有學者指出「宋代是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黃金時期。聞名於世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三項主要是在宋代得到應用和發展的」。[9] 由此可見，宋人的創造力非常豐富。除科學發明外，宋人在體育方面，則發明了捶丸。它反映了宋人創意豐盛，創造範圍甚爲廣泛。然而捶丸與其他傳統球類運動如蹴鞠、步打球、擊鞠一樣，先後在中國失傳。這些情況暴露國人對傳統體育文化甚少珍惜的缺點。反觀鄰國日本，其傳統球類運動繼續保存。面對捶丸失傳與鄰國保護本身運動的表現，國人豈能不進行省思？

6　同註 5，頁 50。

7　凌洪齡：〈捶丸和高爾夫的對比與它們之間的關係〉，劉秉果、張生平編：《捶丸：中國古代的高爾夫球》，頁 139-140。

8　George Peper, *The Story of Golf* (New York: TV Books, 1999), p. 13.

9　王曾瑜：〈宋代文明的歷史地位〉，《河北學刊》，26 卷 5 期（2006 年），頁 95。

香港與中國體育發展
——以李惠堂、容國團、霍英東的事跡為例子

黃耀忠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香港自成爲英國殖民地後，一直是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窗口。以體育運動爲例，賽馬、橄欖球、木球等均先由西人帶到香港，再傳播至內地；1903 年，皇仁書院與英國海軍進行了第一次中外足球比賽。[1] 更重要的是，香港曾協助推動中國體育的發展，李惠堂（1905-1979）、容國團（1937-1968）和霍英東（1922-2006）即爲當中的傑出人物。本文論述三人事跡，藉此展示香港對近代以來中國體育事業的貢獻。

一、亞洲球王——李惠堂

民國時期，由於長期積弱，中國的體育實力即使在亞洲也不算強大，例如在中國、日本及菲律賓參與競逐的遠東運動會上[2]，中國隊的成績並不突出。唯一值得國人驕傲的是，當時中國足球隊於亞洲獨佔鰲頭，在總共十屆的遠東運動會足球賽中九奪冠軍。[3] 足球成了中國體育的象徵，而香港球員李惠堂曾是隊中的「核心人物」，作用巨大，貢獻極多。

李惠堂生於香港銅鑼灣大坑村，是世界五大球王之一。[4] 他在香港皇仁書院讀書，十

1 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中國體育史學會編：《中國近代體育史》（北京：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89 年），頁 426-427。

2 印度及荷屬東印度從第八及第九屆開始參加遠東運動會，見成都體育學院體育史研究室編撰：《中國近代體育史簡編》（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81 年），頁 235。

3 有關歷屆遠東運動會的成績，詳見成都體育學院體育史研究室編撰：《中國近代體育史簡編》，頁 228-235。

4 1976 年，一本西德足球雜誌選出巴西的比利、阿根廷的史提芬奴、匈牙利的普斯卡斯、英國的馬修斯、中國的李惠堂爲世界五大球王，由此可知李惠堂球技之高，名氣之大。見楊繁榮輯錄：〈李惠堂生平大事記〉，載於政協廣東省五華縣文史研究委員會編：《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五華：政協廣東省五華縣文史研究委員會，1990 年），頁 4。

六歲時參加香港夏令足球賽，獲賞識加入南華足球會，開始嶄露頭角，其後又成爲上海樂華隊的球員。[5] 李氏曾自述，「他們說我是改造上海足球的功臣，聞之無限慚愧。不過上海足球，從樂華時代起才繁榮進步，確是不可磨滅的事實。」[6] 顯見李氏在推動上海足球發展方面，功不可沒。事實上，他曾率領樂華隊挫敗臘克斯隊，打破上海華人足球隊從未擊敗外國球隊的紀錄。[7] 李惠堂球技高超，一生獲獎無數，如在 1936 年 8 月獲法國政府體育部頒發紀念金章。[8] 他射球力發千鈞，又擅長「臥射」絕技。據非正式統計，李惠堂在各項賽事總共射入約一千多球。[9] 雖然數字未必可靠，但足以肯定基於李氏超強的入球能力才有如此說法。難怪當時有順口溜云：「聽戲要聽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10]，可見李氏名氣甚大，在「球迷」心目中地位極高。

李惠堂對中國足球的一大貢獻是帶領中國隊稱霸亞洲。自 1923 年入選國家隊以來，他一共爲中國奪得十四項冠軍。其中，他四次參加遠東運動會，三任隊長，每次都助中國隊奪冠而回。[11] 尤其是在第六屆大阪遠東運動會，中國僅於足球賽摘取桂冠；亦即是說，假如當時足球隊也鎩羽而回，中國代表隊將全軍盡墨，可見李惠堂帶領的足球隊爲中國體育挽回一絲面子，意義重大。李惠堂又率領中國隊「衝出亞洲」，參加 1936 年的柏林奧運會；雖沒獲取佳績，但卻贏盡口碑。[12] 1950 年代李氏更以教練身份率中華台北足球隊兩奪亞運金牌，是中國男子足球隊迄今的最高成就。[13] 可以說，李惠堂不但帶領中國足球隊踢出許多豐功偉業，更塑造國家的體育形象：提起中國體育，就令人想到足球。

---

5 李惠堂：〈離了母胎到現在〉，載於《良友》，總第 45 期（1930 年 3 月），頁 13；楊繁榮輯錄：〈李惠堂生平大事記〉，載於政協廣東省五華縣文史研究委員會編：《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頁 1；向勤、穆芷：〈球王李惠堂事跡介述〉，《廣州體育文史》，總第 1 期（1986 年 1 月），頁 8-9。

6 鄭輝：〈李惠堂對上海足球的影響〉，《廣東體育史料》，總第 26 期（1989 年 7 月），頁 14。

7 同上。

8 黎國堯：〈南粵足壇近代、現代大事記〉，《廣東體育史料》，總第 9 期 （1986 年 3 月），頁 50。

9 五華縣政協文史研究室整理：〈球王春秋——亞洲球王李惠堂生平紀實〉，載於政協廣東省五華縣文史研究委員會編：《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頁 19。

10 楨子：〈球王與名旦爭頂〉，《文史博覽》，2003 年第 4 期（2003 年 4 月），頁 31。

11 梁天偉編：《香江百人誌》（香港：壹週刊出版社，1991 年），頁 26； 向群，李棣華，葉北華：〈“一代球王”震寰宇〉，載於政協廣東省五華縣文史研究委員會編：《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頁 128； 楊繁榮輯錄：〈李惠堂生平大事記〉，載於政協廣東省五華縣文史研究委員會編：《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頁 1-2。

12 李惠堂：〈讀書不忘體育，體育不忘讀書〉，載於政協廣東省五華縣文史研究委員會編：《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頁 50-51； 〈首次走向世界的中國足球〉，《齊魯晚報》，2002 年 6 月 21 日。

13 〈李惠堂先生行跡〉，載於鄒瑛主編：《李惠堂先生紀念集》（香港：五華旅港同鄉會，1982 年），頁 7。

李惠堂亦從不同層面促進中國足球的發展。1948 年，他獲國際足球裁判證書，成爲有資格擔任國際裁判的第一個中國人[14]；李氏「能文擅武」，曾撰寫一系列有關足球規則與技巧的專著，包括《足球經》、《球圃菜根集》、《足球技術》、《雜果盤》、《足球登龍術》、《足球規律詮釋》等，實開近代有關研究的先河。有趣的是，李惠堂曾粉墨登場，參演名爲《二比一》的中國首部足球電影[15]；南洋葡萄酒廠以李氏的球衣號碼「NO. 9」爲商標，產品暢銷東南亞；上海「球王牌」香煙亦將李的肖像印於煙盒。[16] 隨著這些產品售往各地，李惠堂所代表的中國足球形象也隨之推廣開去。

二、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容國團

1950 年代，出於報效祖國之心及對共產主義的憧憬，部分香港運動員，如高水平的乒乓球手傅其芳、姜永寧和容國團等陸續返回內地參賽，令中國乒乓球隊如虎添翼，出生及成長於香港的容國團更爲中國奪得第一個世界冠軍。

容國團曾入讀香港的慈幼學校，自小便喜愛打乒乓球，他曾憶述，「我在香港看了一個關於乒乓球的展覽，突然對乒乓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7] 十三歲時，容國團加入香港東區的乒乓球隊，由於球藝了得，被譽爲「東區小霸王」，並在 1953 年的全港校際男單賽取得第三名。1956 年 2 月，美國乒乓球隊訪港，容國團首次代表香港與外國球手較量，初生之犢不怕虎的他輕鬆戰勝美國名將卡蘭。銳不可當的容國團更於 1957 年囊括全港公開賽男單、男雙及團體冠軍，創造香港乒壇的紀錄。[18] 同年 4 月，擁五項世界錦標賽冠軍的日本與香港進行對抗賽。在九龍伊利莎伯青年館，香港冠軍容國團以二比零戰勝當時的世界冠軍荻村伊智朗，一鳴驚人。據《大公報》的描述，容國團「抽、撇、擋都恰到好處」；《星島日報》更指容氏「打得出神入化，節節佔盡上風」；隊員亦稱讚他打出香港人的自

---

14 向勤、穆芷：〈球王李惠堂事跡介述〉，載於《廣州體育文史》，頁 10-11；另李惠堂亦獲英國足球總會授予高級教練榮銜和倫敦球證會榮譽會員，見向勤、穆芷：〈球王李惠堂事跡介述〉，載於《廣州體育文史》頁 11；五華縣政協文史研究室整理：〈球王春秋——亞洲球王李惠堂生平紀實〉，載於政協廣東省五華縣文史研究委員會編：《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頁 18。

15 黎國堯：〈南粵足壇近代、現代大事記〉，載於《廣東體育史料》，頁 46。

16 向勤、穆芷：〈球王李惠堂事跡介述〉，載於《廣州體育文史》，頁 9。

17 茨登科・烏佐雷克那著，陳潔編譯：〈外國記者筆下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二）——容國團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乒乓世界》，2001 年第 6 期（2001 年 6 月），頁 42。

18 蘇根源：《香港乒乓 70 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6 年），頁 70-74；龍翔：〈容國團的香江歲月〉，《星島日報》，2003 年 9 月 7 日，S11；何志毅、梁潛：《人生能有幾次搏——容國團生平紀實》（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252。

信和勇氣。[19] 在香港生活期間，容國團的球技進步神速，迅即成爲 1950 年代香港乒壇的超新星，並爲後來的輝煌事業打下堅實基礎。

1957 年，在主管中國體育事務的賀龍邀請下，容國團返回內地加入廣東隊，翌年便奪取全國乒乓球賽的單打冠軍及入選國家隊。[20] 1959 年 4 月 5 日，他在西德多特蒙德的第 25 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過五關，斬六將，決賽以三比一擊敗匈牙利的西多，勇奪男單冠軍，亦是中國的第一個世界冠軍，誠屬中國現代體育史的重要里程碑。[21] 這個冠軍不但大大刺激中國運動員的士氣，亦代表中國在部分體育項目上已具有世界頂尖水平。法新社便高度評價容氏的球技：「中國的容國團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冠軍。他能夠採用東、西世界乒乓球打法的精華，他既有亞洲選手猛抽猛打的特長，也具備歐洲選手削球的技巧。尤妙的是，他能融會貫通，變化百出。」[22] 《日內瓦日報》又指出，「中國運動員在世界上以優秀選手的姿態出現，這件事看來比容國團的個人勝利更加重要得多」。[23] 容國團代表的是全體中國運動員，他的優異表現自然令西方對中國體育實力刮目相看。其後，容國團在 1961 年協助中國取得第一個世界團體冠軍，1964 年又以教練身份率中國女子隊獲首個團體冠軍。中國乒乓球史上的幾個「第一」，都與容國團息息相關，因此國家兩次記「特等功勛」給容氏，並多次授予榮譽獎章及獎狀，肯定他對國家體育發展的貢獻。[24] 現在中國雄霸乒乓球壇，來自香港的容國團可謂世界乒乓球史上開創「中國時代」的先鋒。廣東珠海市便豎立容國團銅像[25]，讓人駐足緬懷他的輝煌成就，以及再三品味他那句「人生能有幾次搏」的名言。

三、體育慈善家——霍英東

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體育事業百廢待舉，尤其急需恢復國際體壇合法地位，否則將無法參加國際比賽及進行對外交流，競技水平亦難以快速提升。另外由於資金貧乏，國內體育設施嚴重不足，體育健將「難爲無米之炊」。在這困難時刻，香港商人霍英東拔刀相助，爲重振中國體育事業立下汗馬功勞。

---

19 〈容國團挫荻村 劉惠廉贏波邊〉，《大公報》，1957 年 4 月 24 日，第八版；龍翔：〈容國團的香江歲月〉，《星島日報》；龍翔：〈容國團的香江歲月（二）〉，《星島日報》，2005 年 4 月 1 日，S03。

20 〈入志人物——容國團〉，《廣州體育文史》，第十輯（1991 年 9 月），頁 69。

21 〈容國團獲世界冠軍〉，《大公報》，1959 年 4 月 6 日，第一版。

22 華新文：〈世界冠軍容國團〉，《新體育》，總第 149 期（1959 年 4 月），頁 4。

23 何志毅、梁潛：《人生能有幾次搏——容國團生平紀實》，頁 110。

24 同上，頁 253-256。

25 〈容國團：一個先行者的回憶〉，《乒乓世界》，1999 年第 6 期（1999 年 6 月），頁 5。

霍英東生於香港，自小熱愛運動。他認爲，體育不但可強健體魄，更有助凝聚社會和增強國力，因此必須大力宏揚。[26] 拳拳愛國心驅使他協助中國體育走出困境。霍英東不但擁有豐厚財富，亦與國際體育界有密切聯繫，文革後中國十四個單項體育組織恢復了國際地位，實基於霍氏從中斡旋。[27] 他在 1980 年便幫助中國恢復在國際足壇的地位。[28] 重返世界體壇令中國得以再參與國際賽事，亦爲中國體育快速發展鋪平道路。1988 年霍英東又以「中國奧委會」的名義私人捐助 100 萬美元興建奧運會博物館[29]，有利中國與國際奧委會建立良好關係，並提高中國的體育地位。

1984 年，霍英東捐款一億設立「霍英東體育基金」，不斷資助體育設施的興建及各種比賽的舉辦。[30] 他慷慨捐輸，在大江南北興建許多體育館、運動科研基地及學校，爲運動員的比賽訓練和老百姓的強身健體提供良好環境。霍氏經常獎勵傑出運動員，如奧運金牌選手，鼓勵他們再接再厲，繼續爭取佳績。霍英東又贊助籌建中國體育博物館、中國武術研究院及向外推廣中國象棋，不遺餘力地保存及宣揚中國傳統體育文化。在他和兩名兒子的努力下，武術成爲亞運會的比賽項目。[31] 他又曾承諾嘉獎 50 萬美元予非華人的中國象棋世界冠軍，藉以鼓勵西人研習該門中國國藝。[32] 另外，在霍英東資助下，全國首個高爾夫球場及第一支高爾夫球隊得以建立。[33] 至於 1978 年由霍氏倡辦的「省港盃」，不但是粵港足球交流的盛事，亦帶動兩地在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上的發展。[34]

霍英東幫助中國打開重返國際體壇的大門，又大力資助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爲當代中國體育的騰飛創造有利條件。霍氏的貢獻受到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評價，江澤民便讚揚：「霍英東先生爲發展中國足球，特別是女子足球，爲發展網球、高爾夫球，爲發展體育教育、科研，爲發展中國象棋並走向世界，爲弘揚我國的傳統民族體育中國武術都盡心盡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35] 1990 年霍英東獲頒「國家體育工作貢獻獎」，其後又得到「國際

---

26 霍英東：〈我與體育運動〉，載於李敏生編：《霍英東與體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10-20；駱少偉：〈“我見青山多嫵媚”——記愛國情深的霍英東、霍震霆父子〉，《中華兒女（海外版）》，2003 年第 2 期（2003 年 3 月），頁 59。

27 李敏生：〈熱望中華體育騰飛的霍英東〉，《中華兒女（海外版）》，2000 年第 19 期（2000 年 10 月），頁 3。

28 何振梁：〈情繫中華體育的霍英東霍震霆父子〉，《縱橫》，2000 年第 1 期（2000 年 1 月），頁 13-15。

29 何振梁：〈霍英東先生對中國體育事業的巨大貢獻〉，載於李敏生編：《霍英東與體育》，頁 8。

30 李敏生：〈熱望中華體育騰飛的霍英東〉，《中華兒女（海外版）》，頁 5。

31 同上，頁 6。

32 何振梁：〈情繫中華體育的霍英東霍震霆父子〉，《縱橫》，頁 17。

33 李敏生：〈熱望中華體育騰飛的霍英東〉，《中華兒女（海外版）》，頁 4。

34 魏振蘭：〈霍英東與創建省港杯足球賽〉，載於李敏生編：《霍英東與體育》，頁 101-105。

35 李夢華：〈序〉，載於李敏生編：《霍英東與體育》，頁 2-3。

奧林匹克銀質勛章」及獲著名體育學府美國春田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36] 霍英東對中國體育事業的傑出貢獻，無論在國內抑或國外都獲得廣泛認同。

四、小　結

香港不但是西方體育傳入內地的重要窗口，也與內地保持比較密切的體育交流，而且香港更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促進近代中國的體育發展。正如本文指出，民國時期、1950 及 1960 年代及文革以後三個階段，中國體育發展面對不同的困難、挑戰與機遇。在不同時期，來自香港的李惠堂、容國團和霍英東，或是以個人的體育才能提高中國的競技運動水平，塑造體育形象；或是熱心資助建設體育設施、恢復中國在國際體壇的地位，以及促進中港體育交流。由此可見，自民國時期以來，香港一直參與中國體育的發展，而且貢獻良多。當然，作出貢獻的遠不只上述三人，例如：參加 1936 年奧運足球賽的中國隊有 13 名香港球員[37]，像容國團般回國效力的香港運動員爲數不少，許多香港商人也熱心資助中國體育事業等等。

因此，港人應重新認識香港與近代中國體育發展的關係。香港常被稱作「體育沙漠」，而宣揚「香港運動員不是垃圾」則反映外界對香港體育的輕視。從本文可知，香港曾出產過亞洲球王及世界冠軍的乒乓球手，香港其實在中國體育史上有過輝煌歲月，可惜政府當局一直沒有積極宣傳，也許體育成就在金錢掛帥的商業社會實在微不足道。以往，我們強調香港對中國革命、經濟、文學等方面的影響，其實香港也曾爲中國的體育「出錢出力」，中港體育互動關係應該成爲研究香港與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方向。

36　李敏生：〈熱望中華體育騰飛的霍英東〉，《中華兒女（海外版）》，頁 4。

37　金應熙：〈四五十年前的香港體育運動〉，載於金應熙編：《香港史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98。直到 1950 年代，香港球員仍可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國際比賽。

＊＊

◈ 學 界 活 動 ◈

「歷史講堂」好書推薦（2007 年）

＊＊

編號	推薦書籍	推薦人
1	何炳隸：《讀史閱世六十年》 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 年	何冠環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高級講師
2	孫中山紀念館編：《孫中山紀念館展覽圖錄》 香港：孫中山紀念館，2006 年	周佳榮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及系主任
3	Mark C Carnes 編，王凌宵譯： 《幻影與真實》 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沈旭暉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4	林治平等：《序論合集》 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 年	李金強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5	殷燕軍：《近代日本政治體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	趙雨樂博士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6	陳進國：《信仰、儀式與鄉土社會： 風水的歷史人類學探索》(上、下)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游子安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助理教授
7	許倬雲：《從歷史看管理》 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 年	范家偉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講師
8	陸啓宏：《巫師——人世間的魔鬼》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王章偉博士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副編輯
9	孔服禮(Philip Kuhn)著，陳兼、劉昶譯： 《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 台北：時英出版社，2000 年	麥勁生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10	許倬雲： 《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 香港：中華書局，2006 年	劉智鵬博士 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11	張學明、梁元生編： 《歷史上的慈善活動與社會動力》 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5 年	張學明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2	陳世松：《大遷徙：「湖廣塡四川」歷史解讀》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年	劉義章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3	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 香港：三聯書店，2000 年	蕭國健博士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 暨中文系教授
14	逯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 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黎明釗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5	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黃一農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訪問教授

附記：歷史講堂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中華書局、三聯書店合辦，2005 年 5 月開始，每月舉行一次，地點在香港中環三聯書店二樓的創 BOOKCAFE。2007 年中，主辦單位又發起推薦好書活動，邀請一班專家學者每人推介一本好書，載於《驀然回首——歷史講堂兩週年紀念特刊》之中。以上便是推薦書單，讀者可以藉此擴寬歷史視野。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 學界活動 ◈

「歷史講堂」近期活動（2007.4-2008.3）

＊＊

	講　題	講　者	日期／主持
第 33 講	文武界線：北宋初年文武關係的探討	伍伯常博士（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2008 年 3 月 1 日 梁偉基先生主持
第 32 講	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細說唐太宗一生事功	羅永生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008 年 2 月 2 日 趙雨樂博士主持
第 31 講	香港的買辦世家：莫仕揚家族	丁新豹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名譽高級研究員）	2008 年 1 月 5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30 講	錢穆與新亞書院	區志堅博士（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高級講師）	2007 年 12 月 1 日 梁偉基先生主持
第 29 講	陳寅恪與中山大學	蔡鴻生教授（中山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	2007 年 11 月 3 日 鄭德華博士主持
第 28 講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香江	廖迪生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2007 年 10 月 6 日 馬木池先生主持
第 27 講	民族主義與國際政治：以中國爲討論中心	鮑紹霖教授（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7 年 9 月 1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26 講	香港與近代嶺南文化：一個地域文化的探索	鄭德華博士（澳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2007 年 8 月 4 日 丁新豹博士主持
第 25 講	先秦時代華夷觀念之建立及其可靠性	楊靜剛博士（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2007 年 7 月 7 日 李家樹教授主持
第 24 講	利瑪竇與明末清初科技發展	馮錦榮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2007 年 6 月 2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第 23 講	晚清留日運動與近代中國	林啓彥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7 年 5 月 5 日 趙雨樂博士主持
第 22 講	明清戰爭中的西洋火砲	黃一農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訪問教授）	2007 年 4 月 14 日 馮錦榮博士主持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 第二十九屆歷史學會學術週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會於 2008 年 3 月 10 日舉行第二十九屆歷史學會學術週開幕典禮，歷史系系主任周佳榮教授、歷史學會主席司徒嘉豪同學和學術幹事賴達里致詞。3 月 12 日舉辦學術講座，由歷史系講師范永聰博士主講「奧運與國運——淺論北京奧運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學術週至 3 月 14 日結束，其他活動包括有獎問答遊戲及書展等。

■ 新界鄉村文化考察活動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與香港小童群益會合辦「家譜・祭祀・建築——新界鄉村文化考察」，2008 年 3 月 13 日由侯勵英博士主講，並於 20 日到上水河上鄉參觀有關活動情形。

■ 新高中歷史課程知識增益系列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五位學者應邀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主辦「新高中歷史課程知識增益系列」的講者，爲中學歷史科教師作專題演講。該項活動在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的演講廳舉行，詳情如下：

（一）二十世紀亞洲

日 期	課 題	講 者
2008 年 3 月 19 日	日本的現代化與蛻變	周佳榮教授
2008 年 3 月 26 日	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黃文江博士
2008 年 3 月 26 日	東南亞的現代化與蛻變	范永聰博士

（二）二十世紀世界

日 期	課 題	講 者
2008 年 3 月 20 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主要衝突及爭取和平的努力——巴爾幹半島的種族衝突	麥勁生教授
2008 年 3 月 20 日	協作與繁榮	鍾寶賢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 學 界 活 動 ◈

新高中「中國歷史科」課程架構及要點

＊＊

❒ **必修部分——歷代發展**

學習範圍	時　期	課　題	學習要點
甲部：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夏商周	1. 周代分封	・兩次分封形成的政治局面 ・兩次分封促成的民族搏成
		2. 春秋戰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動	・西周與春秋在政治和社會兩方面的不同 ・春秋和戰國在政治和社會兩方面的不同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
	秦漢	1. 秦漢的統治政策	・秦始皇以法家思想治國的原因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原因 ・秦始皇、漢武帝的政策及措施 ・秦始皇、漢武帝統治政策的評價
		2. 兩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王莽篡漢所利用的時勢 ・東漢戚宦掌權的由來及對國運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	1. 北朝的漢胡融和	・北朝漢胡融和的概況 ・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措施及影響
		2. 東晉及南朝的士族與寒門	・東晉、南朝政權與士族的關係 ・東晉、南朝士族與寒門的關係
	隋唐	1. 隋唐治世	・開皇、貞觀、開元三朝的治績與盛況 ・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的歷史評價

		2. 安史之亂與唐代衰亡	• 安史之亂與唐朝國運的關係 • 安史亂後的政局與唐室衰亡
	宋元明清(至鴉片戰爭爆發前夕)	1. 宋元的中央集權	• 宋代的中央集權制 • 元代的行中書省制
		2. 明清的君主集權	• 明太祖、明成祖的君主集權措施及其對政局的影響 • 清聖祖、清世宗的君主集權措施及其對政局的影響
		3. 清初的民族政策	• 清初的民族政策及其影響
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	1. 列強的入侵	• 列強入侵的歷程 • 中國面對的危機
		2. 改革與革命	• 改革與革命的歷程 • 改革與革命的特色
	辛亥革命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 民初政局	• 袁世凱、段祺瑞掌權時的政局 • 山東事件、五四運動 • 外蒙事件、西藏事件
		2. 國共分合	• 國共第一次合作 • 國共關係破裂 • 國共第二次合作
		3. 抗日戰爭	• 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及華北 • 中國全面抗日 • 中國的國際關係
		4. 國共和談與內戰	• 國共和談與內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二十世紀末	1. 社會主義建設	• 政治運動及經濟改革的發展脈絡 • 政治運動及經濟改革衍生的問題
		2.「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歷程 •「文化大革命」衍生的問題
		3. 改革開放	• 改革開放政策與政、經局勢 • 內地與港澳台三地的關係

		4. 對外關係	• 外交發展的脈絡 • 外交成就

❒ **選修部分——歷史專題（任選兩單元）**

單　元	課　題	學習要點
(一) 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	1. 知識分子在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檢討	•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本著民主與科學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 •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擁護及整理 •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歸納的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特點
	2. 知識分子在五四時期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承傳與創新	• 五四時期後西方新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與批判 • 五四時期後中國傳統文化的承傳與創新
(二) 地域與資源運用	1. 黃河流域	• 黃河與國都興廢：自然環境與農耕文化、戰亂對國都興廢與政治發展的影響 • 唐代的長安：長安的盛衰、長安的文化面貌
	2. 長江流域	• 長江與資源運用：自然環境與水利開發、江南開發與經濟重心南移 • 南宋的臨安：背海建都的特點、工商業與文化的發展
	3. 珠江流域	• 珠江與中外接觸：自然環境與農業開拓、海外貿易與工商發展 • 清代的廣州：一口通商與十三行貿易、商品經濟與文化交流
(三) 時代與知識分子	1. 中國知識分子的特色 2. 時代與知識分	知識分子的個案研究 • 孔子（約前 551－前 479） • 司馬遷（約前 135－前 87／前 145－約前

	子的互動 3. 實踐理想與貢獻時代	87） • 王安石（1021－1086） • 何啓（1859－1914） • 梁啓超（1873－1929）
(四) 制度與政治演變	1. 田制與政治興衰	• 概論：田制發展的特色——從井田制的規畫到均田制的破壞 • 專論：北魏至唐中葉期間均田制發展與政治興衰的關係：土地分配與政權穩定的關係、土地兼併與社會動亂的關係
	2. 兵制與國勢強弱	• 概論：兵制發展的特色——徵兵制與募兵制的取捨 • 專論：唐、明兩代徵兵制與國勢強弱的關係：兵制與田制發展的關係、兵制與國勢強弱的關係
	3. 科舉制與人才消長	• 概論：科舉制發展的特色——從唐到清科舉內容的轉變與人才消長的關係 • 專論：明代科舉制與人才消長的關係：考試內容及形式的轉變、官僚集團的成分、社會階級的流動
(五)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1. 道教	• 概論：漢魏南北朝道教的傳播與文化交流 • 專論：南北朝道教與佛教的衝突與調和
	2. 佛教	• 概論：漢唐期間佛教傳播的特色 • 專論：唐代佛教與中國文化的交融
	3. 伊斯蘭教	• 概論：宋元期間伊斯蘭教傳播的特色 • 專論：元代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的互動
	4. 基督宗教	• 概論：明清時期基督教傳播的特色 • 專論：明末清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與調和

(六) 女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1. 中國傳統女性的角色	• 中國傳統社會女性典範的特點 • 理學思想下女性地位的特色
	2. 近代中國女性角色的轉變	• 近代社會的轉變：新思潮與婦權思想的關係 • 二十世紀前期女性在政治、社會及經濟的新角色 • 二十世紀後期影響女性地位的新社會政策

❒ **時間分配（總課時：三年約 270 小時）**

課程架構	學習安排	建議課時
(I) 中國歷史概論	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	8 小時
(II) 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	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	15 小時
(III) 歷代發展	必修部分，分爲甲部、乙部	140 小時 （甲、乙部各 70 小時）
(IV) 歷史專題	選修部分，共有六個單元，任選兩單元	80 小時
(V) 校本評核部分	學習及核評計畫	27 小時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 學 界 活 動 ◈

新高中「歷史科」課程架構及要點

＊＊

❒ 必修部分

學習範圍	主　題	要　點
引言	現代世界的孕育	甲、西方優勢的基礎 乙、西方的擴張及殖民帝國的形成 丙、亞洲對西方擴張的反應 丁、邁向國際協作
主題甲： 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一) 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1. 政治及行政轉變 ▪ 主要發展趨勢 ▪ 不同發展階段的特色
		2. 作爲國際城市的發展 ▪ 經濟發展、都市化與人口轉變 ▪ 中、外文化的共存與相互影響 ▪ 與內地的關係及在亞太地區擔當的角色
	(二) 中國的現代化與蛻變	1. 早期的現代化努力——改革與革命 ▪ 清末新政 ▪ 辛亥革命 ▪ 五四運動 ▪ 南京政府的現代化努力 ▪ 共產主義革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2.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及後毛澤東時代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演變

		▪ 政治體制的確立，以及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 毛澤東時代的現代化努力 ▪ 「文化大革命」及其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 ▪ 1978 年以後的改革開放
	(三) 日本及東南亞的現代化與蛻變	1. 日本 ▪ 日本在二十世紀初的現代化 ✓ 二十世紀初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概況 ✓ 軍國主義的興起及影響 ▪ 二次大戰後的重建與增長 ▪ 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
		2. 東南亞——從殖民地到獨立國家 ▪ 西方殖民主義的影響 ▪ 非殖民地化的起因及獨立運動 ▪ 後殖民地時代的發展；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演變
主題乙： 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四) 主要衝突與和平的訴求	1. 1900 年至 1914 年的國際關係 ▪ 二十世紀初的歐洲：競爭與衝突的起因、爭取和平的努力
		2. 兩次世界大戰及有關的和約的簽署 ▪ 巴黎和會對國際秩序的影響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安排及其影響 ▪ 兩次世界大戰的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意義
		3.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主要衝突及爲和平所作的努力 ▪ 超級大國的對抗與關係緩和 ✓ 冷戰的成因、發展及特點 ✓ 美蘇關係的緩和

		✓ 蘇聯與華沙公約組織的瓦解 ▪ 其他主要衝突及爭取和平的努力 ✓ 主要衝突的起因與發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衝突：巴爾幹半島的種族衝突；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 ✓ 聯合國在維持和平方面擔當的角色
	(五) 協作與繁榮	1. 經濟方面的國際協作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重建、經濟合作與統合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問題與復興 ✓ 美國和蘇聯在歐洲的經濟重建及發展方面擔當的角色 ✓ 歐洲經濟統合的趨向及意義
		2. 社會及文化方面的國際協作 ▪ 人口與資源；環境保育；醫學及科技 ✓ 主要發展 ✓ 成就與局限

❒ **選修部分**

項　目	說　明	研習課題舉隅
(一) 比較歷史	本項目讓學生探討某些互有關聯的歷史現象在某時期不同地域的發展，或探討某地域一個較長時段內歷史的轉變與延續。學生既可從中找出共同點，加深對歷史趨勢及模式的概括了解，也可對某些發展的獨特性作較深入的探究。	▪ 冷戰的影響 ▪ 極權國家 ▪ 香港與上海作爲國際城市的發展 ▪ 蘇聯及中國的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 ▪ 美國在不同時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 ▪ 中國在二十世紀不同時期的人口問題及人口政策

(二) 歷史議題探究	本項目可提高學生對重要的社會及全球性議題的認識與批判性思考能力。學生須探討某一個歷史議題的根源及發展過程，找出並分析這個議題所涉及的各種爭議，從而作出合理的判斷。	▪ 「恐怖主義」 ▪ 「文化帝國主義」 ▪ 流行文化 ▪ 日本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對亞洲的影響 ▪ 核武器擴散 ▪ 全球性的環境挑戰 ▪ 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問題 ▪ 爭取性別平等的抗爭
(三) 本地文化承傳研習	本項目旨在爲有志於與文化承傳相關的行業及機構、或繼續研習與文化承傳及博物館管理相關課程的學生作好準備。學生須以本課程所學的各種研習方式，探究一個與本地歷史及/或文化承傳有關的題目。	▪ 傳統文化及保育(如粵劇、傳統習俗及節日、古蹟及歷史建築物等) ▪ 各行各業(如研習本地品牌及商標、某一行業的歷史等)

❒ **時間分配（總課時：三年約 270 小時）**

課程架構		**建議課時**
(I) 必修部分	引言：現代世界的孕育 主題甲：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主題乙：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10 小時 100 小時 100 小時
(II) 選修部分	「比較歷史」、「歷史議題探究」、「本地文化承傳研習」三項選擇一項	40 小時
(III) 教學活動		20 小時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 學 界 活 動 ◈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架構及要點

＊＊

❒ **學習範圍**

學習範圍	單　元	主題及主要探討問題
自我與個人成長	❶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1）自我了解——個人在青少年期會面對哪些挑戰與機遇？ （2）人際關係——哪些人際關係的因素，能幫助青少年反省和爲過渡至成年階段作好準備？
社會與文化	❷ 今日香港	（1）生活素質——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 （2）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香港居民如何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就法治精神而言，香港居民如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3）身份和身份認同——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是怎樣形成的？
	❸ 現代中國	（1）中國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甚麼影響？ （2）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家庭觀念的演變，展示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有甚麼關係？在何等程度上，傳統習俗與中國人的現代社會是相容的？
	❹ 全球化	（1）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爲甚麼世界各地的人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有不同的回應？

科學、科技與環境	❺ 公共衛生	（1）對公共衛生的理解——人們對疾病和公共衛生的理解如何受不同因素影響？ （2）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科學與科技在何等程度上可以促進公共衛生的發展？
	❻ 能源科技與環境	（1）能源科技的影響——能源科技如何與環境問題相關？ （2）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爲何成爲當代的重要議題？其出現與科學及科技的發展又有何關係？

❒ 獨立專題探究

學生須運用從三個學習範圍所獲取的知識和角度，並推展至新的議題或情境，來進行一項獨立專題研究。下列的建議主題，可用於幫助學生發展自己的獨立專題探究題目：（1）傳媒；（2）教育；（3）宗教；（4）體育運動；（5）藝術；（6）資訊及通訊科技。

❒ 時間分配（總課時：三年約 270 小時）

（I） 學習範圍	180 小時
（II）獨立專題探究	90 小時
合 計	**270 小時**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